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中 國 史 讀 法

管 聽 石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 21 *

(14474)

序

七年前，在建陽暨南大學任教中國通史時，原想把中國史作一簡要的講述；繼思時間太促，——每週僅有三小時，又須於一年內講完這樣巨大浩繁的歷史，如何能够提綱挈領而使大體無遺漏呢？反不如專從歷史的理論上着手，使諸同學先明瞭歷史的真意義與新科學的研究方法，然後再去貫串史實，考驗史實，比之僅僅講些很概括籠統的史事，似乎差勝一籌。

主意既定，遂開始擬就講解程序：以「序論」講中國史學之演變及過去不合理的研究方法之批判等；以「上篇」講辯證的唯物歷史觀；以「下篇」講中國史籍讀法。在講述時，各同學的反應，頗爲興奮；我的心裏，也感到非常滿意。不料講未及半，而黑暗的政治魔力，壓到我的頭上，使我不得不離開建陽。當時有許多歷史系的同學，聽到我快要動身的消息，請我把未講完的一半，於連續的幾小時內概括地講完。我答應了；遂由同學們擇定一較空的教室，由我接連了三四小時；總算草草講完了「上篇」；我隨即於第二天昏沈的天氣裏別了暨南。

此後經受了許多次的壓迫詐騙與凌辱，使我在這接連艱苦的時間裏，淡忘了暨

大講述過的課程。迄至前年的夏天，偶然在破紙堆中，發現了幾張殘稿——這是在暨大所擬的講述大綱。我不覺回憶起當時教學的趣味。我認爲倘能依此寫成一本「中國史讀法」，這對於初讀史者一定是有益的。於是把大綱重新調整過，立刻就寫。

寫了一半，又以病魔的作祟而終止。至去年冬季始繼續寫成三章；本來還想寫第四章「論中國史問題的開展」，奈因身邊幾乎沒有一本參考書；要完全憑記憶去推斷，這是如何危險的事情呵！我於是決定暫以三章完書；待後續補。

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使得法西斯魔鬼及其特務走狗們驚惶狂吠：一部分較爲膽怯的漸漸消聲匿迹，一部分凶惡的更加瘋狂地窮凶極惡。我不能再在家蟄處，於今年一月間帶了這寫成的稿子，悄悄地離開了家，輾轉流浪，至解放軍渡江的時候，我才流浪到了上海。

在恐怖嚴重的上海又蟄伏一個月，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偷偷地取出稿子，細細檢閱，覺得有些太淺略了；但身邊沒有一本書，實在無法可以增補；差幸理論不脫正軌，這還可以發表吧！

上海終於迅速地獲得解放，全市民六百萬分之一的小我也同時得到解放。我隨

着大衆的狂歡而狂歡；隨着大衆的慶祝而慶祝；隨着大衆的向人民解放軍及人民致敬而致敬。我的中國史讀法三章小小的篇幅，也等不及重新增補，而急於拿出付印。我自知蟄居斗室閉戶著作的成品，必然免不了缺漏與錯誤。倘蒙前進的歷史家們予以指正批評，我當以十二分的誠意去接受。

上海解放後三日管聽石

中國史讀法目次

序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讀史的意義

第二節 中國歷史學的演變

一、中國歷史學的發軔

二、封建歷史學的變形

三、封建歷史學的繼續遞變

四、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歷史學的紛紜

五、辯證的唯物歷史學的突起與擴大

第三節 過去不合理治史方法之批判

一、封建主義學者治史方法之批判

甲 以封建倫理為中心思想

二〇

二〇

二〇

一七

一四

九

八

六

六

一

一

乙 以主觀的「博、約、思、辨」爲治史方法……………	二二
丙 以「飾辭」「貫通」爲能事……………	二四
二、資本主義從屬者（實驗主義或機械的科學論）治史方法之批判……………	二五
第二章 讀中國史者應有的認識……………	二〇
第一節 歷史的實踐性……………	三〇
第二節 歷史的連繫性……………	三八
第三節 歷史的發展規律性……………	四八
第四節 歷史的變動性……………	五九
第五節 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七〇
第三章 論中國史籍及史料的閱讀方法……………	七七
第一節 論神話傳說及偽書的應用……………	七七
一、神話與傳說……………	七七
二、偽書……………	七九

第二節	論正史讀法	八三
第三節	論正史以外諸史籍的讀法	九三
第四節	論經子集讀法	九九
一、羣經		九九
二、諸子		一〇六
三、集部諸書		一一一
第五節	論「四部」以外各種文字與地下發掘之史料	一一五
第六節	讀中國史總論	一二七

中國史讀法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讀史的意義

歷史並不像班固所說的僅是「記事」的紀錄或筆記；也不像呂東萊所說的「寓意寄興」的文字作品；又不是梁啓超所說的可爲吾人之鑑的史鑑主義，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發展過程的反映，它與人類活動的事實膠結着而不可分離。所以人類在每一歷史時期的實踐鬥爭中，尤其是目前民主陣線與反民主陣線的鬥爭，格外顯示出敵對階層的相反行動和意識，**每一階級均以相反的姿態參加鬥爭**；它能批評過去指示將來，它能啓發**每一階級鬥爭的情緒**，它更比政治鬥爭來得深刻而有力。

正因爲歷史具有偉大的指導啓發的力量，所以在中國過去漫長的不合理的社會中，一般統治者和御用的學者，都會以自己的立場，利用刪改了偽裝了的歷史，作爲欺瞞羣衆誘掖羣衆的工具；甚至更澈底的毀滅了它。前者如「唐鑑」「資治通鑑」「通鑑綱目」「御批通鑑輯覽」等作者的曲斷妄煨變更事實真相。後者如秦始皇

皇的焚毀六國典籍。從表面上觀看，似乎後者的手段來得兇狠。其實，後者遠不如前者的毒辣。因為史實一經竄改，批評一經失當，就會使歷史的正確的指導性與啓發性，反變爲歪曲的誘惑性；適足爲統治者所利用以作欺瞞大衆壓迫大衆的工具。幾千年來爲了「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不知多少人不明不白地犧牲在忠孝貞節四個字的頭銜上。

目前竟然還有幾個自命爲清高的歷史學者，像鄧之誠一流，他們不承認歷史學是與現實的社會配合着的；更不知道歷史是有啓發性和指導性。他們以爲研究歷史是超然的；可以閉戶窮經，不問世事。他們固然反對錢穆、胡適這批人的研究方法；但也不承認歷史是可以作政治鬥爭的手段。這種頑石般的歷史學者，他們的研究是呆板的，是不合科學的；同樣地會爲統治者所利用。再退一步說，倘使歷史真個沒有啓發性和指導性；那末秦始皇爲什麼要燒盡六國的典籍，宋、秦檜爲什麼要嚴禁私史，滿清的皇帝爲什麼要嚴厲辦理明史獄，日本的統治者，爲什麼不許朝鮮人研究朝鮮史乘。頑固的歷史家呀！你祇要睜開眼睛，仔細地觀察一下，你或許會覺悟到自己的研究有點空虛。

再就歷史的指導性與啓發性的效用來說，也可以分爲理性的與感性的兩面。理

性的效用，恆屬於專門的深入的一方面。感性的效用，是廣大而普遍的。所以遵循正確的活動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而認識歷史學正確的理论，如歷史進展的必然的規律性，與質量互變的所以然，及時空的個別與普遍的聯系；因此，決然毅然地指出歷史所指導與啓發人們的是祇有前進，絕不會停止後退或循環；不合理的矛盾的社會必然地在革命的浪潮愈漲愈高而達到突變時期被揚棄了。但這種啓示是限於一部份能研究史學與明瞭史學者，至少能領略史學的理论者；這是較難普遍的。只有在感性一方面；如統治者的自私自利與殘酷地抑壓民衆的行爲；被統治者的困苦呻吟而無從申救的事實；更有被統治者的積鬱憤恨而掀起烈烈轟轟的革命運動；又因此運動而使人欣快地推翻了統治者的寶座：這些可悲可泣可恨可恥的事實，一經明白地正確地普遍地傳入大衆的耳膜，激動大衆的情緒，就立刻使大衆如潮水般泛濫起來。所以這種感性的啓示是普遍的廣大的，而且有無限的力量。

反之，史實一經乖謬，理論一經曲解，它在羣衆的理性與感性上，可能失去了指導與啓發的作用，而變成相反的欺惑力量：「尊卑本有定分，」「治亂自屬循環，」「天命攸歸，非人力所能強，」「勞心勞力，勢必有治人與治於人之分！」這些玄學的歷史理論，安排好一連貫的史實，更嵌上褒貶的辭句，也會使人在理性

上發生疑懼而或信以爲真。因此，它能够使得一般懦弱的民衆有所畏懼，更能使得一般受騙者做了統治者的犧牲品。再加上添裝而成的忠臣義僕孝子節婦等等的殉難死節及報仇殺敵的故事，渲染得慷慨激昂！這自然也會使得普遍的人們在感性上起了迷惘的作用；二千年來的御修歷史，都曾經負過了這重大的使命。

到現在，一班御用的學者和幫兇的歷史家們，更加無恥地巧妙地竄改史乘歪曲歷史理論，想爲統治者延長其垂死的壽命。他們不是說中國的士人，一向沒有階級，就是說中國的舊有道德是最高尙最中庸的永恆不變的道德。有些更利用馬克思、列寧的言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歷史上；以主觀的反革命的判斷，強嵌入馬、列的言論；於是證明中國社會，還需要資本主義的改造，用不着羣衆的社會主義性的革命；或者說中國社會早已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便需要共產主義革命，這些極右極左的言論，一樣地同具有破壞民主革命的毒素和阻滯歷史的用心。雖然反動派的荒淫無恥貪婪狂妄使得中國的政治日益腐敗，經濟日趨崩潰，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是他們歪曲的言論也無法掩蔽其矛盾的事實。然而竄改的仍然繼續竄改，歪曲的仍然繼續歪曲，無恥叫囂的仍然大聲無恥的叫囂，更佐以兇狠過於秦始皇幾千萬倍的焚坑手段，使得軟弱的人們容易怔住，一部份意識模糊的青年容易被誘惑

而走入迷途。

但曲解與誘惑，甚至兇狠的殘殺手段，只能起了偏面的作用，決不能使歷史倒退或停滯；所以也決不能使統治者的寶座永久保持下去。被統治者的忍耐與自慰是有限度的，到了衝過飽和點的時候；忠義的頭銜，不能籠絡了；亂賊的定名，不能恐嚇了；歪曲的歷史理論，在羣衆的憤怒與叛亂的前面而被踐踏得粉碎了；兇狠的焚坑手段，相反地使羣衆的革命情緒更加高漲了；於是歷史的正確的理论，隨着統治者寶座的傾頽像旭光般照射出來。

於此，我們決不應認爲歷史必然性的進展而坐着等待社會的轉變；甚至感到欣慰自滿而不去施用分毫的力量；這種頹廢的自私的態度，和頑固的歷史家們有着同樣的罪惡。須知客觀的事實和主觀的理解是互相配合着的，互相辯證發展的。現在革命的事實正配合着革命的理論，向前進展；而革命的理論，也正以科學的辯證的歷史爲指針。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斯大林等革命領袖，無一不致力於歷史的探討；更無一不以歷史的正確理論從事指導羣衆啓發羣衆。所以我們於此時應該跟着革命指導者和前進的歷史家們，提出正確的研究歷史方法、以從事歷史的探討；更應配合羣衆的革命運動，從事歷史理論的鬥爭。在羣衆奮勇突擊前進時，我們也

同樣地奮勇前進；把虛偽歪曲歷史理論，打得粉碎；這是我們研究歷史者應有的態度，也是我們必須研究的理由。

第二節 中國歷史學的演變

一、中國歷史學的發軔

前面已經明白指出：歷史決不是超現實的而僅屬紙面上所記錄着供人欣賞考據，或是在文辭上作點綴的典故而已。它必然要與現實的社會膠結着。所以在中國過去的一段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被一般封建主所雕塑而成的歷史學，都是封建的歷史學。更可以肯定的說一句，所有中國過去封建時期的歷史書籍，都是替封建主說話的歷史書籍。固然虞、夏以前的氏族社會的傳說，與殷商奴隸社會的貞卜文字，也不能不算它是歷史。但前者只不過待考證研究的一部分的歷史參證資料；後者雖確為真實的歷史，但仍屬零碎的幼稚的古典的歷史產物，沒有成爲有意義的有宗旨的史籍。到了封建社會開始，歷史的質量也隨着改變；所謂右史記言左史記事，以及內史太史守藏室的史官等等，都足以證明統治者已懂得歷史的作用，而專門爲了它設立許多官職來管理，來記載。但還沒有理由可以說明它是成爲有作用的

封建性的歷史學。這種封建歷史學的草創的作品，就是「春秋」。它的作者，就是爲封建時代的統治者所尊崇的孔子。在孔子作「春秋」以前；我們固然不能說沒有這樣類似的史乘。但現在所僅存的，却只能說「春秋」是第一部了。「春秋」的宗旨是正君臣夷夏之分。「春秋」的作用，是使亂臣賊子懼。因此，它就成爲二千年來封建歷史家們所奉爲圭臬，甚至且尊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雖然也有幾個大膽的學者，對它疑惑，或是譏爲斷爛朝報；但決沒有減損它底分毫的威風。

於此，應該鄭重說明的：「春秋」與它底產生時期的現實社會是適應的，吻合的。當時的社會現實情形是生產力逐漸長大；如農業器具的進步；工業生產的由大地主私家經營而轉入各工人自由工業；都市商業的興起與人口的集中；行商的規模益形擴大；以及自由置產的風習逐漸興起。但另一方面，却暴露了封建主的驕奢及連年用兵而使統治者的國庫瀕於枯竭；又因封建主對農奴的加重剝削而使農奴無以爲生。再看當時的政治情形，是掌握最高權力的周王已陵夷到不能與諸侯的卿大夫爭衡；諸侯大地主已漸失了他的統治權威而爲他底陪臣次大地主所襲取。過去所謂戎狄荆蠻爲諸夏所膺懲的國家，却突起而憑陵諸夏。但另一方面，封建集權的趨勢已成了雛形；都邑的離心組織已漸變爲郡縣的向心組織；這一切互相聯繫互相制約

着的而又隨時隨地發現矛盾的經濟政治形態，都說明了周代初期的封建社會已臨轉變時期。生在這時期的孔子，以安定社會為職責的孔子，以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為號召的孔子，以周公為模範的孔子，自然也跟着惶惶而不安起來。所以他在無法施行他的保守政策的時候，只有用口誅筆伐的方法，在「春秋」著作時，施展他的伎倆。「志在春秋」，「行在春秋」不是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意識嗎？

二、封建歷史學的變形

隨着時代的進步，封建性的歷史學也起了進步的變化。周朝分權封建的形式轉進而為秦、漢集權封建的形式，這是由於生產力已有了質量的變化。那表現於歷史學一方面的，是「春秋」的歷史方式變化而為「史記」的歷史方式。這在量的方面，是由簡略的條記式的僅祇幾萬字的編年歷史，進步而為詳述始末洋洋數十萬言的紀傳歷史。在質的方面，則以周王的歲月作為提綱挈領而表示尊王的大一統的名義，進步而以本紀為綱世家列傳為輔的君權集中的實質；僅以一字作為褒貶而極其零碎散漫的「春秋」，進步而以論贊為殿有整個系統的「史記」。這都可以看出作者者的意識也隨社會而進步而轉變了。所以孔子的意識是初期封建社會轉變期一般較進步的封建地主的意識，「春秋」適足以代表它。「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的意識

是封建社會王權集中初期士大夫階層的意識，「史記」適足以代表它。

但我們不能因「史記」已較「春秋」有了相對性的進步，而錯認「史記」爲合理的非封建的作品。要知「史記」與「春秋」是同樣的以尊君抑臣爲主旨，同樣的爲封建主子辯護，同樣的不許小民有犯上作亂的行爲。雖然司馬遷曾經遭受了廢刑，在文字上不無怨懟之語；但他確自認是孔子的繼承者，且默許「史記」是上承「春秋」。所以自整個性質上言，「史記」與「春秋」仍是一樣的封建性的不合理的歷史。

三、封建歷史學的繼續遞變

從秦漢之間起到了東漢中葉，社會基礎有了相當的變化，如農業牧畜工業礦冶等等的進步，邊疆及荒蕪土地的開闢，陸商道路遠達歐羅巴之貨幣的使用已益普遍；這種種事實，都證明了歷史已轉變不少，因此適應政治的是王權集中力量的偉大，離心的封國制度逐漸消滅，以及反映出一般士大夫階級的意識形態，是讖緯說之盛行與古文經學之興起。至於史籍方面的代表作品是「史記」轉變而爲「漢書」。過去一般人都以爲「漢書」是模倣「史記」；而且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同型的史書，現在要將它別而爲二，似乎要使人懷疑。誠然，一部「二十四史」確是同型

的，同具封建性的，而又都是御修的史書。原來中國自西漢以及清初，社會的進步性很濡緩；所以表現於史籍一方面的，也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決不能說它完全沒有轉變；試拿「史記」與「漢書」的形式來比較：前者是較簡約的通史，後者是較詳備的斷代史；前者是「本紀」「世家」「列傳」三級遞降的敘述方式；後者則祇有「本紀」「列傳」二種；前者述及制度文物的是富有批評性的「書」，後者是多屬紀錄式的「志」；前者是依據社會進展的史實而平射的多方面的寫作，後者則以漢代帝皇為核心而成拱衛式的書法。再從形式而說明其內含的性質：則可自通史與斷代史之分，看出分權的封國制度已逐漸消滅而轉變為王權獨尊的封建制度的含義；又自「本紀」「世家」「列傳」三級的遞降與「本紀」「列傳」二者的分列，看出「漢書」是映露出社會上已經消失了小封主經濟的力量與作用；又自批評變為紀錄，多面的平射方式變為核心的拱護方式，更可看出王權力量的偉大與鞏固及大漢一統思想的形成；這種種顯然的轉變的跡象，是無可辯諱的。

從漢末以迄隋初，經過了無數次間歇性的變亂；中原一帶，被低度文化的五胡所割據，漢民族僅保有江南一隅。這時生產力已經被破壞了不少，雖然在局部上也有不少進步；但從整個社會的進展情形看來，却緩慢得像蝸牛的蠕動一般；尤其

是偏安王權之不克穩定，大地主經濟之時遭摧殘。這表現於史籍一方面的，是官修史乘，如「宋書」「齊書」「魏書」等之淺陋不足道；其他還有半官修性質的，如陳壽「三國志」、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習鑿齒「漢晉陽秋」，以及裴松之「三國志注」，裴駰「史記集解」等等，不過在形式上有編年紀傳及史注的分別，若就內容言，却沒有一部可以說是比「漢書」更進步的代表作品；只有到了唐代，才發現顯然進步的史書。

唐初因政局的暫時穩定，生產力也跟着向前進展，農業工業的生產技術以及美術工藝都有了進步：這樣使得唐代統治者初期所定的租庸調剝削制度，不得不改為兩稅制。因此反映於歷史學一方面的，除了官修史籍如「隋書」等較前略為詳實外，還有私人著述的前所未有的史評「史通」，及分類史「通典」。前者是以犀利的目光，大膽地批評已往史籍；即經聖人刪訂過的「尚書」和聖人手作的「春秋」，也發生疑惑。後者是以幼稚的邏輯分法，把過去的史實歸納成七類。這種客觀的批評，與近科學的治史方法，實足證明作者的意識是基於社會質量的推進，已達到自由商業資本大量興起及手工行會發生時期。

唐代封建性的統治力量，只能有暫時的穩定；決不能永遠地鎮壓下去。卒因矛

盾發展達到了高度飽和點而傾覆了唐代。接着的是半世紀的混亂，人民生活不克安定，生產力亦跟着被局部的破壞；以至歷史的進步性轉成濡緩的形態。一直到宋祖平定江南，重建宋室的統治政權，社會始又暫時安定下去，生產力又呈突飛猛晉之象；大規模工場的建立，工業行會的組成，商業資本的膨大，貴族商人地主的土地兼併，使得封建保守勢力與新興工商業資本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尖銳起來。這表現於政治一方面的，有傾向保守的司馬光一派的舊黨人物，有代表自由商業資本的小市民的王安石和他部下章、楊一派的新黨人物。再表現於歷史學一方面的，有保守派的著作，如范祖禹「唐鑑」司馬光「資治通鑑」，及專以模倣「春秋」爲能事而毫無歷史價值的朱熹「通鑑綱目」；這些史書，無疑的都是以穩定封建秩序爲目的；而「綱目」表現得尤爲露骨。至於新派的歷史著作，則有黃震的「古今紀要」，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通考」，袁樞的「紀事本末」；這些都是以初步科學的方法研究出來。又如倪思的「班馬異同」，吳慎新的「唐書糾繆」，孫甫的「唐史論斷」，劉義仲的「通鑑問疑」，這些又都略具批評的端倪。所以新派的著作，顯然是一般新興小市民意態的結晶。

宋代的末造，經過了一次大變亂；低度文化的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摧殘了生產

手段，破壞了生產力量，社會的進步性因此遇到極大的阻礙。這表現在歷史學方面的，如官修史籍——宋、遼、金、元史——之退化，及私人著作之消沈。但自明中葉以後，社會經濟狀態又顯著地向前開展；手工業的大規模工場及壟斷性的商行組織，在江、浙、粵南一帶已漸漸地相繼成立。這表現於歷史學一方面的，有王夫之「讀通鑑論」，充分地露出小市民意識的自由研究及懷疑的精神；繼之又有黃宗羲「明儒學案」，邵泰「史記疑問」，楊陸榮「五代史志疑」，尤以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開中國學術史研究的端緒。這種歷史學的進步，正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已向前進步，就是以保守封建勢力為宗旨的敕修史書，如「明史」「續通典」「通志」「通考」及「清通典」「通志」「通考」等，也較前代的官修史籍為詳密。及至乾、嘉之間，中國的封建社會已臨最高點，轉變的跡象已很明顯；在這一時期的封建性的歷史學，也達最後關頭。考證學派的著作，就是代表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意識，他們的歷史作品，如全祖望「讀史質疑」，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通鑑注辯正」，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章實齋「文史通義」等等，都是中國封建性的歷史學最後期的產物。至於清季柯劭忞的「新元史」，可說是他們的餘波了。

前面歷述中國封建時期歷史學的演變，與中國社會辯證的進展，是互相適應，互相映射；但因現在所存的史籍，祇有代表大封建主及士大夫階層以至小市民階層的意識與作用；而代表被壓迫階層農奴的意識與作用的史籍，可說完全沒有。所以前面所說的，也不過從上層史籍偏面的觀察，再加以合理的剖解而已。

四、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歷史學的紛紜

在中國封建社會行將轉變的時候，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勢力，突然闖進國門；自鴉片戰爭起一直到了清末，經過了幾次被侵略的戰爭與不平等條約的強迫簽訂，使得中國的社會，日漸陷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在這一變化時期中，表現在歷史學一方面也異常紛紜；有代表新興民族資本階級的公羊學派，他們的歷史著作，大都是零星的，只有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總算與史學有關的有系統的產物；到後來有夏曾佑所著的「中國古代史」是這一派的最後殿軍了。

五四時代的疑古運動會風靡一時，這與公羊學派是同質的。原因在五四前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因矛盾衝突而發生的第一次大戰，使得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無暇向遠東擴展；因而中國衰弱的民族資本，一時乘機抬頭。這表現於歷史學一方面的，就是繼公羊學派之後的疑古學派。他們的作品，大多彙集於「古史辨」裏。

當時更有代表買辦資本階級的學者；他們的研究歷史方法，是以機械的考證法爲骨幹，以西洋實驗主義爲依歸，這充份表現出歐、美資本主義的從屬者的有買辦階級的習性。他們的代表作品，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等；而最反復最無恥的是前爲「古史辨」的主角，證明夏禹爲爬蟲；後爲御聘史官，證明夏禹的生日是六月初六的顧頡剛。再如傅斯年一流，可憐他們沒有大部著作，不過在這一派中，已經滾得發臭了。

再有代表封建殘餘的學者，他們以保守舊封建道德爲自高，像柳詒徵、王國維一流人物。王氏的「觀堂集林」，確於歷史學上有相當功績；柳氏的「中國文化史」，則沒有可取的地方。

還有本來是封建的餘孽，依附到買辦資本主義學者的門下，裝得不像牛頭，不成馬面，只看見他的依違時好、奔走權貴、以取祿位而已。這一派的最著名者，就是反動統治者所稱許的歷史家錢穆，他的代表作品「中國史綱」，正暴露出這種卑鄙的意識。

還有用假辯證的科學方法來裝飾門面，以欺蒙世人；實則仍是買辦資本階級的

走狗。這種著作發現得最反復最徬徨而且毫無定見的，是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封建社會史」等等。

還有以學者自居，不關世事而閉戶著作的，像鄧之誠一流；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

總之，在這一時期中，基於社會變動的劇烈；所以表現於歷史學一方面也異常紛紜。其中代表新興民族資本一派的今文學家與專以反封建為事的疑古派的史學主義的走狗買辦階級的傾軋，與殘餘的封建勢力的排擠；以至未臻飽滿而中途被扼殺。所以這一派的歷史學僅有一時期的孱弱的光芒而旋即黯然無聲。至於代表封建殘餘的歷史學家，也因時代的進步，封建殘餘勢力決不能抵抗外來資本主義與內在的買辦階級的表裏競爭，所以他們也趨於衰沒的境界。僅有少數大地主與買辦階級勾結起來，希圖鎮壓新興的民主力量以保持殘喘；這一派的歷史家們，大多數仍不免懷着悲哀與末路之感；自然也有幾個會吹附的，與買辦階級的歷史家們合流而一時喧赫起來；但無情的時光，決不縱容它，眼見得將來與買辦階級性的歷史家必然同歸於盡。再說到這批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出賣中國羣衆的買辦資本階級，暫時藉欺

騙的言論與武力的壓迫，如火如荼地登上了統治者從屬的地位，使得一部份的柔弱者爲之嚇昏了。但不久的將來，滅亡之神即嚴厲地降到他的頭上；他必然地爲憤怒的羣衆所打倒。所以這一派無恥的歷史家們，目前正在做着帝皇太史迷夢，而想法用新理學新考據學來爲統治者掩飾爭氣；但真的歷史學的開展，怎肯容許你這樣地卑鄙地幹下去呢。

於此應該補述的，代表中國民族資本階級的今文學家與疑古學者，近來雖然雖然無聲，但與他站在同樣立場的歷史家，仍在熒熒地閃爍着。中國是需要發展民族資本，中國是應該走着新民主的統一路線，所以代表這般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家，也因反帝反封建的同情，與新興的以唯物辯證的方法從事研究的歷史家們，暫時取得統一的陣綫。你看研究「莊子」的馬敘倫先生不是以饕餮高年還與帝國主義的走狗們誓死抗爭嗎？

五、辯證的唯物歷史學的突起與擴大

五四以半殖民地的民族資本階層爲本質，展開反帝反封建運動，提出「德謨克拉西」與「賽因斯」的口號。在這一時期的辯證的進展中，使得過去爲人所不經意的農工階級中的優秀份子，覺悟到自身的重要，而起來作合理的要求。更有一般知

識階級中的前進份子，因受國外國內情勢的刺激，而注意於社會主義學說的探討；也有進而求實踐的工作者。這樣一來，反映於歷史學方面的，自然也有嶄新的姿勢，開始出現在社會上的第一部而合乎辯證方法的史籍，就是郭沫若先生所作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雖然在這一部書裏，還有些地方值得重行研究，但郭先生草創之功，是任何研究歷史者（只有統治者的御用學者和走狗除外）所承認的。

繼郭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後，有許多文章討論中國社會的進展與中國史上許多重大問題，這可說是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其中對於中國社會的進化的各階段，如奴隸時期、封建時期、資本主義時期等等，都有過熱烈的爭辯。但參加的戰士們，雖都以馬、列的理論為依據；而且博引馬、列辭句，以辯護己說；惟因史料搜採欠博，立論欠精，故流為經院派之詭辯習氣；對於真正歷史學的開闢，成功尙少。

接着，我中國民族來了一次很慘巨的解放戰爭，在這戰爭的經過中，把社會上邪正是非的陣營，嚴正地明顯地對立起來。於是歷史家們也跟着裂開了邪正的兩面：站在正一方面的，自始至終，堅決抗敵，擁護民主，抱不屈不撓的精神，與妥協者投降者偽民主者作無情的爭辯；像華崗、翦伯贊、何幹之、郭沫若、鄧初民、

呂振羽諸先生所發表的著作，雖然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但均以正確的實踐的科學方法去從事研究，却是一致的。尤其是翦伯贊先生的「歷史哲學教程」，指出歷史的正確的理论，批判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見解，最足為學習歷史者的指針。其餘如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等，何幹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啓蒙運動史」等，或闡明中國歷史的發展，或討論中國歷史上未解決的問題，對於中國的史學，均有相當的功績。

反之，那些邪偽的投機性的或是認識欠精確的自命為新科學的歷史家們，自從抗戰以後，經不起洪爐的煅煉，有的已現出狐尾，跪到南京，跟着一批民族的叛賊，唱大亞洲主義去了，後來雖然回轉重慶，仍然在中央做御聘史官，仍然唱反民主的論調，與全國人民大眾為敵；有些則闐然無聲，有些則自以為學者，飄飄然像煞一代之帝師也。

但青年的眼睛是雪亮的，邪偽的和不正確的著作，決不能與真正的歷史學為敵。他們這一批人的歷史著作，不是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個青年前去睬它嗎？反而為反動政府所明令嚴禁的，或是暗中禁人閱讀的，倒反而風行全國；一般研究歷史的，個個都有無法買到好書的感想。

翦伯贊的「中國史綱」已經出版了二卷，范文瀾等合著的「中國通史簡編」，亦於最近出版；此外零星的科學歷史著作及論文，更接踵而起。中國新歷史的境界將更擴大。但我們決不能以此為滿足，更不能以此而聽任客觀事實的發展，而忽略了主觀自動的努力，況且中國歷史科學的研究領域內，還存在着無盡的未經採掘的寶藏和未墾的荒原。這些責任，都落在後起的青年的歷史家的肩上，大家一致努力吧！爭取新歷史的光明與民衆解放的勝利。

第二節 過去不合理治史方法之批判

一、封建主義學者治史方法之批判

甲、以封建倫理為中心思想 在封建社會裏的歷史家們——上層階級及其從屬的歷史家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秩序為他們的惟一職責；那維護的法寶，就是儒家所揭櫫的「三綱」「五常」。固然在漢武尊儒以前，儒家並不能算為獨尊的國教；但尊君抑臣的口號，在任何的家派裏，都被認為定則，只有戰國時的農家除外。

三綱的要義，就是君父與夫是上層的治理者，臣子與婦是下層的隸屬者。更明

白地說：這是中國特殊形式的以宗法爲骨幹的封建制度下的產物。因爲子與婦做了父與夫的隸屬，父與夫做了子與婦的治理人，這是宗法制度的形態。通過了這形態而統治之以君，那末一層層的統制下來，使得封建組織，更爲鞏固。所以代表上層階級的歷史家們，如何不揭櫫「三綱」爲不可顛仆的定義呢？

以三綱爲主而佐之五常的倫理道德：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更使得封建性的倫理學說，有了一貫的系統。封建社會裏的統治階級，就拿這道德來作懲賞臣民的定律；封建歷史家們，就拿這道德來作褒貶的尺度；好像不明瞭儒家的倫理觀念，就不配讀歷史。他們提出一句漂亮的口號：「作史應有褒貶」，「褒貶必須公正」。什麼褒貶公正？只不過是拿儒家的綱常來衡量而已。

又因儒家的宗祖，儼然是中國國教的教主；所以封建的歷史家們，除了信守儒家的倫理外，還須「宗孔」「尊經」。不宗孔，就是「放僻」；不尊經，就是「邪侈」。「放僻」「邪侈」之論，不怕秦灰，定遭孔炬；可怕的封建社會呀，稍有正義的史籍，想都無法立足；難怪我們現在看不到過去封建黑暗時期裏一些代表下層階級說話的史書。

像唐代著「史通」的劉知幾先生，他是富有客觀的態度，他敢疑古惑經；但他仍不敢反對孔子，反對「經書」；他仍以「春秋」爲不刊之言。到了清中葉的崔東壁先生，他是毫無忌憚的批判了許多古籍；他的疑古精神，較劉知幾爲進步；但他對於儒家的倫理道德，仍然信守。又如著「文史通義」的章學誠先生，他的研究歷史，已有科學精神；惟所謂「言公」「史德」，仍以舊有道德爲讀史者之先務；這班在封建社會裏較先進的史家們，代表小市民階級意識的史家們，也仍恫嚇於封建的力量，有不能不馴伏的態度，封建主義的潛力，實可驚怖。

總之，封建性的治史方法是玄學的，是不合理的；它是準備替統治階級說話的；所以它必需將讀史者的意識，造成同樣的規範；「宗孔」「尊經」就是這個意義。

乙、以主觀的「博、約、思、辨」爲治史方法

首先應當申明的：我們決不可像觀念論者的說法，把觀念孤立地格律地去印證，應當實踐地連繫地去研究。所以說到封建性的博、約、思、辨的治史方法，不能解釋爲資本主義性的機械的邏輯方法；更不能解析爲辯證的科學的方法。因爲封建性的博學，固然也有「熟讀」「閱讀」「參考」「詢問」「遊歷」等等途徑；像孔子所說：『博我以文，』又說：

『吾猶及史之闕文，』司馬遷所說：『通天人之變，窮古今之理。』他又曾經遍遊名山大川。劉知幾曾說：『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中國封建時代的歷史家，好像沒有一個不以殫見洽聞爲先務。但他們的博學却有一個主觀橫在心中，即是「宗孔」「尊經」。所以他們的閱讀史籍，必先熟讀「五經」，次及「子」「史」，像劉知幾所說：『經猶日也，史猶星也。』這種重經輕史的態度，自然會把歷史的範圍萎縮了，真相迷糊了。至於「約」的方法，更不像近代科學家所說的歸納方法。他們是以「取正舍邪」「取直舍曲」「取精舍泛」爲主要目的。所謂邪正，是合於儒家倫理的史籍爲正，不合儒家倫理的史籍爲邪；所謂曲直，是褒貶適當者爲直，不適當者爲曲；適當與否的批判，自然也取決於儒家的倫理道德了；所謂精泛，是指雜引民間瑣事者爲泛，注重統治階層之言行者爲精；像這樣的取舍方法，正是合乎孔子所謂「約我以禮」的宗旨了。至於思的方法，就是所謂「深思遠慮」「探索幽隱」；這可說是完全憑主觀去摸索，而不是合乎科學方法的思考。其中固然也有許多學者，用深思的工夫，想出許多合理的事情，像劉知幾「史通」——「暗惑篇」所說，頗多糾正事實，近乎科學方法。但如宋司馬光、朱熹及諸理學派的歷史家，他們則專從倫理上苦思；這分明是玄學的幻想而已。至於

辨的方法，就是辨真偽，辨是非，辨邪正。像司馬光「通鑑」以魏爲主，朱熹「綱目」指爲扶邪；一定反轉以蜀爲主，以魏爲寇，才算合乎歷史的正道了。這樣的辨別邪正，當然得不到歷史的真實性。反而一批非正統的歷史家，不十分信服儒家倫理道德，到能辨出史實的真偽。他們的功勞，我們不應埋沒他；所以我們時常對一批反宋學的歷史家們，寄以極大的同情。

丙、以「飾辭」「貫通」爲能事 「飾辭」「貫通」二事，依嚴格地說，是屬於作史範圍，與讀史無大關係。不過封建時代的歷史家們，向來都沒有把讀史作史的範圍分得十分仔細，大概一說到讀史，必連帶說及作史；所以現在也附帶加以批評。他的所謂「飾辭」，是指「釐訂篇目」「修飾文辭」「整理段落」等等工夫；所謂「貫通」，是指把歷史的事實與意義連串貫通起來；這種專從文字上用工夫的方法，在封建社會裏却會發生過極大的力量；像歐陽修的「五代史」專從文辭上用功；若在史實上看，我可保險地說一句：「遠不及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可是因爲歐陽的文辭好，文名大，竟把「薛史」擠得幾乎絕種。可見封建時代的歷史家，並不注重史實，而專以修飾文辭獻媚統治者爲能事了。

再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本來還可稱爲有條理的詳實的歷史

書；但封建時代的讀史者們，時常稱贊「史」「漢」「氣度好」「文章好」，足見他們的治史，把形式看得重於內容；「喧賓奪主」，可說是他們的寫照。

二、資本主義從屬者（實驗主義或機械的科學論）治史方法之批判

生產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裏的實驗主義者或是機械的科學論者，他的本質已帶有列強資本主義的附屬性；所以一談到歷史研究方面，多數是歐美觀念論史學者的應聲蟲，很少數是從自己的基地裏誕演出來。前者以胡適為代表，他的說法，都是承襲美國實驗主義學者杜威的口吻。後者以梁啟超為代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雖然仍是機械的科學方法論者的姿態，但還可說是具有民族文化的本質。

不論是承襲的或是從自己的基地裏誕演出來的，在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裏，代表資產階層的歷史家，他們的治史方法，總脫不了形式邏輯的窠臼，與主觀的直覺的應用而已。

以形式邏輯來治理歷史，這是實驗主義者或是機械的科學論者所自炫為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實則這種呆版的機械方法，若應用在一事一物上的考證，可能得到相對的效果。清代乾、嘉間的考據學家和史學家們，早已運用過這種方法，而且運用得很仔細，很嚴密；他們會發掘出不少歷史上的寶藏，辨明了不少歷史上的訛

謬，他們的功績，確屬不少。但以此法去治理整個的歷史，則決不能答出合理的結論，必然與封建性的歷史學者一樣地陷於迷惘的路徑。因為不明瞭歷史進展的規律性及質量的互變與突變的理由，更不明瞭矛盾衝突與對立統一的現象；而且怕聽階層間的衝突而引起革命的事情，僅從表面的形式上，去依附比擬；似此勢必完全走入觀念論的大本營去。所以當歷史的事實顯出不合理的階段必須被揚棄時，這批實驗主義者與機械的科學論者，就徬徨無緒了；只得歪曲地說：「歷史是循環的」，「歷史是永恆缺陷的」。

實驗主義者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認識，分明地全是主觀主義。可是他們偏偏不承認；在這裏，我到佩服梁啓超的慷慨，他說：『治史者須將此整個而活的全體相攝取於吾心目中；然茲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蓋尙有待於直覺也。』（「歷史研究法」）至於胡適輩，則口口聲聲談客觀談科學，實則胡適把歷史比作大錢，可以任人們去擺佈；又把實在比作女孩子，比作大理石，可以任人們去裝飾去彫刻；這樣忽略了事實本身的存在，而提高了個人對事實的意志的作用；不是純主觀主義的治史方法，還是什麼。

實驗主義者與機械的科學論者，好談因果關係。梁啓超在他的「歷史研究法」

一書中，屢次說到：「原因如何？」「變遷如何？」「影響如何？」又說：『現代之史，必注目於此等事項（指經濟、制度、人口、交通、宗教、文化等部門的事），校其總成績，以求其因果，然後史之爲物，乃與吾儕之生活，不生距離，而讀史者，乃能親切而有味。』胡適亦曾說：『明因求果。』又指出歷史的方法是祖孫的方法。於此切不可誤信他們的因果論，就是適合歷史的辯證的聯繫的因果性。要知歷史中的一切事實，一切運動，都是互相連繫着的，互相配制着的；沒有一事一物，可以孤立起來而專從偏倚的象跡，機械地規定其因果。所以說到因果關係，只有在一定性的條件下，才會使前的現象產生了繼起的另一現象；先行的現象爲因，後起的現象爲果。但尋求這種前因後果的時候，常常是把諸現象的聯結交錯，加以幾分的簡單化；而且把整個的運動過程，以某種側面人工地孤立起來。所以要理解現象的因果關係，萬不能忽略它的聯結交錯；也不能規律地固定它何者爲因，何者爲果。倘使一經固定，則因與果便會變成爲硬化的象跡，而陷入主觀的窠臼。不僅此也，卽就其零碎的事物的象跡上所得的因果，也只是片斷的偏倚的象跡；決不能說明整個事實的真理。實驗主義者與機械的科學論者，所提出的因果關係，正是限於一事一物的象跡；正是因果的格律；不是在連繫性的史實中，理解出因果的

關係。梁啓超曾提出：秦、司馬錯之定蜀，與諸葛亮之平蠻，爲漢族進行擴展的重大因素；殊不知這兩件事，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各方面有着錯綜複雜的聯繫；不過在聯繫的整個的史實中，所可指出的顯著的象跡而已。梁氏單獨的提出這兩件事；而且對這兩件事，特別的加以誇大，叫讀史者從這兩件事，去尋求漢族的擴展；而遺忘了他的本身的連繫，這是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回答。

實驗主義者與機械的科學論者，又好談歷史的進化；叫人在研究歷史時，須要尋求歷史進展之跡。但他們所謂進化，仍然是零碎的指着一事一物的進步；而且不諳質量互變與質的突變的真理，及歷史進展的必然的規律。他們以爲人類社會的進化，是漸進的，是和平進展的；自初民以及今日，只是一步步的推移，一滴一滴的增進，決沒有被揚棄的階層，也沒有突變的事實。然而歷史告訴我們，自氏族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至社會主義社會，這些各階段不同的社會，雖然後者跟着前者，後者是從前者的廢墟上生長出來；但各階段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突變出來的。所以不諳這個進展的必然律與突變的真理，而偏倚的去尋求進化，則所尋得的，也只是主觀所指定的象跡，而不是整個的歷史進化的事實。

實驗主義者，又拿出最後的法寶；他說：「研究歷史要精詳嚴密」。就是說：「搜尋史料要詳」，「選擇史料要精」，「判斷史實要嚴」，「研究史實要密」。誠然，研究歷史者的態度，自然要審慎嚴密；而搜尋史料，當然也要愈精詳愈好。不過實驗主義者與機械的科學論者，專從偏僻的史料中，找出一點一滴的事實，去籠罩整個的事實；或是依此去推翻歷史的真理，而反自詡為精詳嚴密，這樣只有替歷史加上一重障礙物，而決不會研究出一部好的歷史。所以夏禹的生日，也有根據了；清代康、雍、乾奴役漢族的功績，也值得歌頌了；人民的叛亂，也應該征剿了；實驗主義者與機械的科學論者的最後法寶，就是如此。

總之，僅依據歷史的零碎固定的象跡，以格律的方式去研究，不論你如何廣博，不論你研究得如何勤奮，你始終答不出歷史的真理。

第二章 讀中國史者應有的認識

第一節 歷史的實踐性

讀歷史的人們，首先應當明瞭的是歷史的實踐性。因為歷史是人類實踐活動繼續的累積。它雖然經過紀述與理解；但決不會因為一經紀述便變為理智的製造品，而使歷史與現實分離。它必須攝取人類實踐活動的真相，而且必須反映出具體的活動的事實。倘使歷史只是理智的製造品，具體的活的事實又是過往的外在的客觀的事實。那末歷史與現實分離為二。這種歷史，就是空虛的歪曲的歷史，是毫無價值的歷史。

有些反動的史學家們，以為讀歷史先要記住偉大人物的事業，歷代典章的沿革。比如讀中國史，應該注意秦皇、漢武、唐宗、明祖一類英雄帝皇的事業，與夫蕭、曹、房、杜、蘇武、岳飛一類賢相忠臣的功績；更應把歷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分條別類，記得清楚，研究出孰是孰非；這就算讀歷史了。那裏曉得這種方法，是完全錯誤的讀法。雖然化了無限的功夫，却得不到一點真確的歷史；相反的只是走入了歪曲的迷途。

因爲這種讀法是失却了歷史的實踐性。他把歷史當作英雄的試驗場；只有英雄才能創造歷史。殊不知英雄乃適應當時社會而生；他完全與當時其他的人一樣受着社會現實的支配與決定；他也一樣的實踐本階級的任務。雖然他對於歷史也有多少推動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是偶然的；他決不能改變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法則，而隨着他個人的意志來創造歷史。比如秦始皇之并吞六國建立王權集中的官僚政治，是因爲當時社會生產力的進展，引起封建地主與新興商人地主的競爭；而且歷史決定後者必然要擊敗前者。秦始皇所代表的正是商人地主的集團，所以他會惡狠狠做出許多驚人的事實。漢武帝的開疆拓土是因爲漢代生產力量的澎漲，引起當時商人地主對於擴大商品市場及保護商運的要求。漢武帝的政策正適合這商人地主的需要；所以有了這開疆拓土的功業。唐太宗和明太祖的欺詐手段，也不是特殊的本領；正因爲隋代與元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到了極度緊張的時候；被壓迫的農民階級爲了實踐階級任務而盪起抗爭的時候；唐宗、明祖就利用這一變動而欺騙了農民大眾，取得了帝皇的寶座。這不是他的本領能平定羣雄改造社會，而是他的舉動正適合了這一時代的趨勢，所以他會騙得成功。至於蕭、曹、房、杜一輩的賢相，只不過當時封建地主集團中的第二流代表；曾經幫助過他的主子盡了欺騙羣衆壓迫

羣衆的任務；沒有什麼超奇出衆的事業。若說到蘇武、岳飛一輩的忠臣，那似乎是值得頌揚的民族英雄。但蘇武仍然是當時地主階層的一員；他所效忠的仍然是本階層的主子——漢帝；他並沒有替中國下層人民說過話爭過光；他所表現的行動和意識，正是本階層任務的忠實履行者。岳飛的主戰，也是當時小地主意識的表現；在當時地主階層內部發生矛盾時，他爲了實現自己集團的意識而犧牲了。所以英雄的意識和事業，也正被決定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若捨去了社會現實的基礎，而專從英雄的意識和事業上探討；這顯然地得不到歷史的真理，而僅僅收獲了一些模糊的假像。

況且過去的史籍，所記述的英雄事業，大多是過去史家任意渲染而成的不切實的記載；或許正與事實相反：一個狂嫖濫賭的流氓劉邦，可以變成豁達大度，子女無所取，財帛無所好的賢明漢高；一個奸猾的巨商劉秀，可以變成誠厚忠恕的漢代中興皇帝光武；一個殘殺兄弟極其淫惡的李世民，可以變成縱囚不殺仁德無邊的貞觀之治。這種專爲着本階層利益，而寫成的欺誘臣民的英雄傳記，非但在歷史的基礎上言，是不值得研究；即從個人的行動對於歷史的影響而言，也須要大量的增減和改造。

至於中國歷朝的政治制度等等，都是適合當時統治的階層意識的作品。它爲了穩定當時的社會關係，爲了保障上層的權益，它於是乎適合了歷代王朝的需要而有所增改。所以政治制度，也決定於當時的現實，並不是政治制度的好壞，可以決定當時社會的榮衰。觀念論的歷史家們，不敢正視現實，不敢從活辣辣的階層的實踐上去研究，想用上層的意識作品來支配整個的歷史；因是提高了政治制度的效用與重量，這是應當駁斥的。

有些道德論者，以爲讀歷史應當分別人類德性之善惡，而推論其事業之成敗，與施政之得失。比如：周代有文、武之德，才有成、周之治，與八百年之國運；五霸以力假仁，故僅能成霸業而不能成一統之治；三代以下的君主，道德都有缺點，所以國祚不長治業不盛；歷代亡國之君，都是因爲沒有道德的緣故；王莽和王安石的變法不能成功，是因爲他們『沒有「關雎」「麟趾」之意，所以不能行「周官」之法度』。赤眉、黃巾、黃巢、李自成之流，因爲犯上作亂，全無道德，所以應當剿滅；孔子雖有聖德，可惜沒有當位，故不能兼善天下；這一類的專憑道德爲準繩的歷史觀，也同前面說過一樣的失却歷史的實踐性；把道德當作永恆不變的歷史測量表；把人類的意志超然的升架在現實之上；把整個歷史引到虛無漂渺的境界；

而使人們陷於迷惑空虛的幻想中。

原來「道德」是人類在社會關係的實際條件中所規定出來的一種意識；尤其是上層人物以自己的立場規定了適合於上層意志的善惡觀念。所以社會關係的實際條件必然會因時空而變遷；那道德的觀念，也會隨時隨地而改變。甲地與乙地，前代與後代，必然有不同的或相反的道德。道德論者偏偏要拿「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這一類專為上層階級辯護的格言來證明了道德的永恆不變；叫人們以這偏面的道德，去衡量歷史；這不是欺瞞，是什麼？

試就前面所引的一班人的道德與他的事業關係而言：周文王的道德，據儒家說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的忠臣。這「忠」字的道德，分明是儒家專為統治階級設想而規定出來的道德觀念。而且周文王曾經翦伐過許多殷的同族，反抗過殷的命令與儒家所稱忠順的事實，完全背道而馳。周武之道德，是在於「伐暴救民」。其實當時周武之對殷用兵，完全是因為周氏族內生產力之膨漲，必然要求擴大生產領域。加以殷奴隸國家內的矛盾，已達十分尖銳化。周武的聯軍進入殷都，殷國家所用以從軍的奴隸，倒戈而潰。這不是「伐暴救民」，而正是歷史進展的必然的實踐行動。至周代初期之治業，是由於奴隸制正在崩潰，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建立之時，

生產力突然增加，社會暫時得到安定。這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的統一，絕不是周文、武的道德所使然。五霸的紛爭，是當時地主階層內部的衝突，也是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中，上層階級爲實踐自己的要求，而任意犧牲其被奴役的臣民；並沒有什麼道德高低的差別而影響於王霸之業。秦、漢以後王朝的盛衰，都是各時代的經濟關係，使得社會在辯證的繼續進展中，表現出或安或亂的形態；雖然人事的影響，也不能完全抹殺；但決不能以道德之善惡，而決定歷史之命運。至於王莽變法之失敗，是因爲王莽要反抗歷史的進展規律性，要消滅當時新興的商人地主，要恢復初期的封建形態，這是必然會失敗。王安石變法之失敗，是因爲上層階級內部的衝突，王安石所代表的商人小地主的力量，一時不敵大地主保守勢力之堅強；但王安石死後，新法仍然有許多是實現的。總之，讀史不從人類實踐活動的真相上去研討；而專以上層意欲所構成的種種觀念去籠罩事實，那必然是上了欺騙者的當。

還有一些神學者，高唱歷史是被天命所支配，以「天命攸歸」「王者天授」的一些宗教式的謠言，把歷史真相淆亂了，把人類階級實踐完全抹殺了，叫人只從「通鑑綱目」一類的史籍上去用功，這樣的讀史，無異於教徒的誦經。

更有一些觀念論者，以爲歷史是循環的，以爲歷史是作者的觀念所構成的；更

有機械地專重地理自然之環境，以之判定歷史；這些都是不真確的偏倚的根本不知道或抹殺了歷史的實踐性。

那末，讀史應該如何去認識歷史的實踐性呢？這就是要知道歷史的基礎的推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生活鬥爭。

因爲人類爲了各個人的生存，必須獲得物質的生活資料，便不能不發生各式的鬥爭。從開始幼稚的物質生活之生產，以至發展到高度的生產力；人類在一貫的生產實踐的鬥爭過程中，引起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之不斷的矛盾的統一與分裂；這就是歷史的實踐性的關鍵。所以我們要讀歷史或是中國史，先要注意各時代生產力的如何獲得？如何因此而改進生產方式？如何因此而改變生產關係？即是注意各時代的經濟狀況，更要注意經濟條件所驅使人們走到各式的鬥爭。

姑就中國的史實來說明吧；最古是巢居穴處的有巢氏時代，人們僅能利用最原始的生產工具——未經琢磨的石器，以從事幼稚的捕漁采集生產；所以形成了不識不知的原始社會。繼之是知道用火的燧人氏時代，人們能利用較進步的石器以從事狩獵生產；所以產生了快樂活潑的集體生活社會。再進而至炎、黃、虞、夏之間，人們有了最進步的石器和磨琢而成的骨器，即由狩獵生產進至畜牧生產，更發現了

農耕與蠶絲，因而建立了羣策羣力的禪讓的氏族社會；又因此而驅使人們有了氏族間的鬪爭。更進而至夏代，人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更加進步，或許有了銅器，於是使母系氏族演變而為父系氏族，社會上開始有了私有財產與脫離生產而專事勞心的少數的人們。更因此矛盾分裂之擴大，改變了整個社會的質，而為殷商之奴隸生產社會。從此以後，中國史上裂開了明顯的階層；人們不斷的實踐着階級任務的殘酷鬥爭，而推動歷史的基本力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也不斷發生矛盾的統一與分裂。殷商的奴隸社會是基於使用了青銅器的生產工具，以從事畜牧與農耕生產。周代的初期封建社會，是基於使用最進步的青銅器與初期的鐵器，以從事農業生產。秦、漢以後各時代遞變的官僚集權封建社會，是基於各時代繼續進步的鐵器生產工具以推進擴大農耕的生產。清代中葉以後，生產力演進到快要變質的時候，突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國內正在發育尚未脫離母胎的資本主義扼殺了，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些一連貫的歷史實踐的事實，證明歷史運動的發展，確是基於生產力的發展，及因此發展而構成階級的鬥爭。因此我們翻開中國史籍，就不應被聖君明主忠臣義士高人逸客等等虛偽觀念所迷惘了，也不應被禮治法治道德感化等捨本逐末的論調所欺誘了；我們應該首先搜尋或考察那一定時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狀況。

況，並去追尋其先行時代的生產機構，及考察這時代之經濟狀況所引起的傾向，尤須注意這一時代的生產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間的鬥爭情由。

至於各時代的政治學術、宗教等意識形態，自然也為讀史者所應當研究，而且要研究出它的反撥作用；不過從歷史的實踐性上說來，不及經濟來得重要。

於此還有一點須要鄭重說明的：人類實踐活動的過程，不是隨便可以想像出來的；必然是要從實踐行動中去考察。所以只有進步的革命的實踐行動者，才能徹底瞭解這正確的事實。反之，如不能革命或不革命的保守者，決不會進行革命的實踐活動；從而他也決不會瞭解歷史的實踐性。因為祇有被壓迫的被支配的下層羣衆，與認識正確的革命行動者，才從本身的實踐行動中，識別出社會上相反立場的人羣，堅定地秉持革命的正確理論，從而也能瞭解歷史發展的實踐性。在目前中國的新民主革命行動中，可以證明：祇有站在革命一方面的學者或歷史家，他們堅決不撓地與反革命的理論奮鬥；祇有他們才正確瞭解歷史的進展規律，祇有他們才能揭發階級鬥爭的實情，祇有他們才能認識歷史的實踐性。

第二節 歷史的連繫性

說明了歷史實踐性之後，接着就要提出的是歷史的連繫性。因為歷史是整個的連續的不可分割的。在時間上言：各時代是相互連續，沒有一剎那中斷過。在空間上言：各方面是互相影響互相侵潤，沒有一絲一毫間隔着。在個別與全體言：是互相配合，互相啓示，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可以超脫一切而獨立的。在人類與自然言：是互相牽連，互相制約，決沒有違世獨立的超人。所以讀歷史，必須注意歷史的連繫性。

先說時間的連繫：中國過去一大堆的史籍，都沒有注意到：所謂「正史」者，正是以帝皇為中心，把時代硬強地割斷；這顯然是極不自然的。我們姑且不說質量的繼續轉變情形，而僅就人事上言：「正史」的「本紀」「列傳」，已經是前後朝分不清楚。本朝的開國皇帝和他的祖宗，必然要數至前朝。本朝末代的臣子，做到下朝的二臣，也必然要連及兩朝。「正史」的「表」「志」，也一樣的牽連數代：「漢書」之「古今人表」「藝文志」等，都不限於漢代的人物與書籍。這種斷代的方法，在作史者自己想來，恐怕也感到生強了。

有些自命為科學的歷史家們，其實是資本主義從屬性的歷史家；他們推翻斷代史的作風，而另闢所謂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現代史等名目；仍然把歷史的

各時代強硬地割斷；主觀地造出各代不同的現象來；這種錯誤，與斷代史同出一轍。

其實歷史的時間是連續進行，無時或斷，從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密切連繫地相互轉化；其間雖有所謂突變時期；但後起的質，必然從被揚棄了先行的質的廢墟中建築起來；先行階段的諸殘餘和後起階段的諸芽苗，是必然地連繫着的。試就中國史而言：殷代的奴隸社會，是由夏代父家長氏族社會轉變而來；惟有追尋出夏代氏族經濟結構之狀況與其分裂之原由，才能說出殷代奴隸社會誕生之本質。周代的封建社會，是由殷代奴隸社會轉變而成；惟有尋出殷代奴隸生產機構崩潰之狀況與原因，才可說明周代封建制度之真實性。秦、漢以後之封建社會雖在繼續進展，而本質未變；惟有在各代的遞變中，尋出前代與後代生產機構之連續與改進之程度，才能定出各時代都是一樣的封建社會。清代中葉以後，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會；這必然要從先期的社會狀況中，考察出將興的資本主義尚未誕生，已成夭折的胎兒。此後中國的歷史傾向，必然由新民主的道路走上社會主義的宮殿；這也須從目前的社會結構中考察出來。所以歷史固然有突變的時期，但決不能執定突變時期，

而截然劃斷了兩個階段。況且所謂突變時期，更不是可以瞬息的時間來劃分先後兩階段全體的差異；中間必然有交互的不均一的現象。比如殷代奴隸社會轉變而為周代封建社會；我們決不能以為周師進入朝歌、殷紂自焚之日，就是兩階段劃分之期。要知在周師回鎬京之後，殷的國土內與周的王畿內，尚廣泛地存在着奴隸生產形態。周代封建社會之主要的建立，當在周公誅武庚之後，而完成之期，尚在宣王之時。

次說歷史的空間，也處處是連繫着。無如中國過去的歷史家們，大多昧於此理，硬把空間劃分了；以自己的民族國家為主體，而藐視周圍的各民族國家；把自己誇大為華夏，把其他藐視為夷狄；把自己的行為意識標為正義，把其他的行動目為鄙賤；以這樣的意識去作史，自然不會有真確的歷史；以這樣的意識去讀史，自然也得不到歷史的真理。試看「正史」中之「南史」與「北史」，「宋史」與「遼史」「金史」，每同述一事，却有相反的記載；這便是硬分彼此的緣故。近來也有中國民族史等著作，似乎想把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流徙分化，平等地敘述出來；但仍然沒有注意到國內各民族間的相互連繫的條件，及中國以外各民族的相互影響，是以仍然留了一個缺陷。

要知歷史上的各氏族和各民族間，只要有了一部分一分子的直接或間接的一次或多次的接觸，便會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中國自最古時代起，就同四方氏族有了接觸；虞舜之流四凶，其實就是和周圍的氏族打了幾陣勝仗；虞夏之征三苗；殷代之征鬼方、呂方、虞方等氏族；周武之徵師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族；周穆之西游崑崙諸地；周宣之北伐獯豸，西征犬戎；齊桓之北伐山戎；楚、莊躡之通滇、蜀；燕、趙之於朝鮮、匈奴；秦代之南懲閩、粵，直達交趾；漢代之二次擊敗匈奴，使之西徙而激成歐洲民族之大變遷；晉代之五胡入據中原，又是各民族交互浸潤之事實；漢、唐兩代之通西域，商人足跡遠達羅馬、大食；元代地跨歐、亞，統治了中國及歐、亞間之許多民族，更在歷史上成爲各民族之大交融；清代以東胡民族入主中國，與漢族幾乎完全同化；至於東方之日本，自漢以來，即與中國發生交涉，直至最近之二次世界大戰，侵略去中國三分之一的土地，使中國民族受到莫大的創痛與警覺；西南之印度，自漢代即有僧人往來，至唐更盛；北方西伯利亞諸原始民族，如流鬼、夜叉等，唐代亦曾與之發生關係；南洋羣島諸氏族，明代曾以大規模之招撫方式，與他們通好；除這些事實外，恐怕還有較遠的地方，甚至北美的阿拉斯加與歐、非的西部，或許也和中國民族發生過關係的可能。

時至今日，更是世界歷史交流的時代，一民族的動向，都受整個世界的動向所支配；一民族的變化，又立刻足以影響整個世界。所以我們讀史，不從各民族的聯系性上着手，決不能得到真實的歷史。

再次說到個別與全體的連繫，那就是指個人與羣衆，一事與整個的相互關係。這在歷史上，更爲重要。茲姑先就個人與羣衆言之：中國前代的「正史」，都以「本紀」爲主，「列傳」爲輔，專重個人之言行，而抹殺個人受社會條件之支配與羣衆之推動；這是完全錯誤。近日反民主的歷史家們，更慫恿人們去從事偉人傳記的研究；希望以此而鼓吹英雄的力量與暴力的成功，使法西斯革命的政權，獲得了歷史理論的支持；這完全是一味毒劑。要知偉人之所以能成爲偉人，必然他的意欲和行動，是適合於當時的整個民族或一個階級的生活要求；所以他才能爲當時羣衆所擁護；他才能以羣衆的力量，完成他的事業；否則他就不能成爲偉人了。周武伐殷的勝利，是因爲當時民衆要求推翻殷貴族之生產支配權；周武正領導這一民衆所要求的革命，所以會有無數民族之合兵，與殷國家奴隸之響應，使得有衆如林力能格獸的殷紂，只有自焚而死。漢高之能覆滅秦社，戰敗楚項，是因爲利用當時民衆一致要求推倒秦代之殘暴的封建貴族；與夫漢高所領導之新興商人地主、在社會

經濟發展之需要上，必然要代替了項氏所領導之舊分封地主；所以會很順利地降子嬰進咸陽，更戰敗了叱咤風雲千人辟易的霸王。以後歷代王朝開國的皇帝，都是利用了羣衆的生活要求，或是民族解放要求的心理，而取得領導權；因而乘機出賣了羣衆，而重登帝王的寶座。就是在正史上誣蔑他們是叛逆的一班未成事的革命領袖；如張角、黃巢、李自成一輩，也都是以羣衆之意欲爲意欲、以整個下層階級的生活要求爲要求，而領導民衆去從事革命；雖然有其他複雜的關係，而使革命未能成功；但決不能誤信反動歷史家的話，以事之成敗，完全繫於個人意識行爲之正當與否；好像轟轟烈烈的大事業，與羣衆沒有關係；這是如何愚昧的謊話。

但是還須明白：個人固然脫不了大衆，而大衆也脫不了個人。在歷史鬥爭中，在歷史的事業建設中，一個領導者的作用，是不能抹殺的。當舊階段行將崩潰，新胚胎行將產生的時候；有了偉大的革命領袖，自然會使革命事業早些完成，新社會機構早日建立。這不是說偉人有改變歷史進展必然性的功能，而是說偉人有推動歷史動變的效力。有了殷紂的殘暴，周武的英明，使得周之革命較快速地成功；有了清廷的腐敗，孫文之堅決奮鬥，使得中華民族早日脫離滿族之壓迫。太平天國、義和團的失敗，對於領導者意識的錯誤，亦大有關係。此次中國的新民主革命，若沒

有偉大的革命領袖，決不會有今日如此快速的勝利。所以專以個人爲中心而輕視大眾的歷史觀，固然完全錯誤；若機械地專以歷史進展的必然的規律性，呆板地應用在歷史上，而忽略個人偶然的力量；也是錯誤的。

若就個別事物與整個言之，那更顯然是連繫着的。可是反動的歷史家們却會昏鬧得完全不懂了。中國歷史界自從唐之杜佑以幼稚的邏輯方法來整理歷史，固然使歷史界前進了一步；但個別事物與全體的聯系，却仍然因分類而顯得不統一。清代乾、嘉諸儒，專以一事一物之考證，窮年累月去研究；雖有一枝一節的發明，却没有顧到整個事實統一之發展。近年來的實驗主義者，很巧妙地專把歷史各種事物分隔開來，叫人們用格律去分類比擬，把歷史變成一種呆板的器械。更有機械論者，專以經濟的發展去從事歷史的研究，而忽略了整個歷史的聯繫。甚至還有專以地理人口等條件而判斷歷史：「中國地大物博，自不會爲異族所同化。」「金陵爲帝王之都，自然會應運而生不世出之偉人。」這種種更其荒謬之論調，專爲反動法西斯之統治者張目；我們更應斷然駁斥他。於此我們提出正確的歷史觀：就是個別事物與整個之連繫。比如研究中國之學術思想及宗教政制等，當然必須從各階段之社會經濟結構上去探索；而研究中國之經濟史，也必須顧及各時代之政制學術宗教等意

識的反映影響。總之，辯證的科學的讀史方法，不是呆版的機械的零碎的，而是整個的聯繫的變動的；個別是整個之一體，整個是個別的集成；以這樣的歷史觀去研究歷史，方不走入歧途。

最後說到人類與自然的連繫，也為許多過去歷史家所不解。唯心論的玄學者們，以人類與自然顯然別而為二，毫無連繫；有靈性的人類，可以獨立建造人類的歷史；而無知的自然，只有聽命而已。反之機械的唯物論者，以人是自然之一，人與自然同是物質，毫無分別之可言。兩種論調，都是錯誤。因為人類是從猿猴進化而成；在最初的時候，必與自然界一樣的生存着；這是人類與自然連繫之一。人類的生活實踐，自施用石器生產工具，進至鋼鐵電器的生產工具；自采集生產方式，進至蒸汽電器工業生產方式；可說無時可以離開自然；這是人類與自然連繫之二。人類是整個自然界之一；人類終始與自然共存着；所以人類社會之發展，也是整個自然界之發展；而且發展的過程，人類與自然，一樣的存在着矛盾之統一與分裂的規律性；雖然人類不像自然的單純化；而却與自然有相互推動或制約之作用；這是人類與自然連繫之三。不過人類是有意識的自然，特殊的自然；他的意識有反映的作用；這與自然界又不能混同為一。觀念論者之分離人類與自然，分明把人類送進

飄渺無根之天國裏去；而機械論之混同人類與自然，又把人類陷入呆版黑暗的地窖。以辯證唯物論的眼光去觀察，自然與人類正是辯證的統一。

以上所指出的歷史連繫性，雖然分成四項主論；但仍然需要統一去。因為時間與空間，個別與全體，人與物，都是連繫着的。讀史者應該隨時隨處注意歷史之整個連繫性；讀一時期的歷史，須注意其前行時期之轉變情形，及此時期所引起的動向；讀中國史必須注意中國周圍的民族，甚至世界各國的交互關係；讀一人的傳記，讀一事的本末，均須注意全體社會之整個機構及進展狀況。於此更提出四點以供讀史者之助。

(一) 遇到歷史上之重大事件，萬不能因其重大而過於誇張，以致周圍先後之各事件，完全失其作用。

(二) 歷史上各個別事物及推動歷史的各條件，不能因為各個的連繫，而忽略其個別的重要性。

(三) 讀歷史固然要依據客觀事實，但不能完全無主觀之判斷。

(四) 讀歷史固然應該有主觀之判斷，但不能加強主觀而失去客觀之現實性。

第二節 歷史的發展規律性

提起了歷史的發展規律性，不得不回顧到前面說過的實踐性與連繫性。因爲人類的歷史實踐生活是在不同的時空中相互連繫相互制約着發展開來；從這些具體的發展開來的事實，抽象出人類一般的客觀的法則，這就是說明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譬如人類是無論任何民族任何地域，都是由人猿轉化爲人類。又如在人類創造并使用勞動工具的進程上，一般都是由木器、舊石器、新石器、金石器、鐵器、而蒸汽機器、電器。又如人類在其歷史發展中，都經過無階級的氏族社會，才轉化爲敵對階級社會——即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的兩性關係，都是經過雜亂婚、血族婚、彭那魯安、對偶婚、才進到所謂一夫一婦制。這是人類歷史發展共同的法則。絕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區域所能獨異的。

但是人類歷史的發展，固然有其一般的法則；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因其發展條件之不同，與時空的關係，也能給以不同的特殊性。譬如中國之奴隸社會，具備着家族奴隸、土地國有、中央集權、公社分裂以及國家治水等形態；這不同於希

臘、羅馬之廣大奴隸，從事市場生產、莊園生產的形態；也不同於埃及、巴比倫奴隸社會諸形態。中國之封建社會，因長期之變化，存在着王權集中、官僚專政、宗族制度、家庭奴隸、國營工商業、土地自由買賣、宗教自由信仰等形態，不同於歐洲之土地割據、政權分裂、宗教獨尊等形態。近百年來中國受帝國主義之侵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社會；真形態既不同資本主義社會，又不盡合於封建社會。這些特殊的現象，絕對不能掩蓋或蔑視。只有把一般的和特殊的作統一的研究，即是從特殊性中識別其從屬於一般法則；更從一般性中，探求其特殊形態；如此方能得到歷史之真實內容。

中國正統派的歷史家們，完全不懂得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史」裏所說的話，滿口是「天命」「天意」，這便是把歷史當作是永恆的，是神的創造物；所以只有神的意志，沒有歷史自身發展的規律。又有唱天命人事二元論者：歐陽修說：「雖曰天命，豈非人事？」這又把歷史當作天神與英雄共同創造之總體。近來的實驗主義者們，倡實事求是的高調；把中國殷代以前的傳說與神話，完全當作虛偽而遺棄了；從中國歷史上刪去了共營共享的古代氏族社會，而僅僅留存着階級社會；這樣就可以把歷史當作柔順的女子，任他們的意志去粧扮；於是中國的社會，既無前期

的氏族社會，也決不會發生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歷史只是永恆的在統治勢力下進行。這種荒謬的歷史觀，顯然是替法西斯政權作理論的護符。更有主張循環論者，把歷史看作循環發展；把歷史發展中的各時代，看作可以重複再演；把歷史進展的規律性完全抹殺了；這種用意的險毒，比前者還要加甚。再有一些消極論的歷史家們，只看見歷史的黑暗面，只懂得歷史上不合理社會的鬥爭；於是以悲觀的口吻說：『中國一部二十四史，只是一部殺人的悲慘的歷史。』這種看法，也是錯誤，也一樣的不懂得歷史的發展——一定有先期的合理的社會，更必有將來的更合理的社會。歷史的一般性，確是從人類發展的具體事實裏抽象出來，決不是任意可以想像的觀念。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上，曾明白地指示：『大概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可以作為經濟上社會構成之相續諸階段。』這是關於全人類不分畛域的一個必然的發展的規律。但是為了這一系列的公式，引起了許多歷史學者的爭論。還有無恥的法西斯學者如日人秋澤修二之流，利用這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加以曲解而為法西斯辯護。這對於初步的讀史者，恐怕仍有迷惘的影響。所以將這「亞細亞生產問題」，「奴隸社會問題」，「商業資

本主義社會問題」，根據近年來進步歷史學家們推論的結果，予以極簡單的說明：

先就亞細亞生產方式來說：有以地理史觀的立場，斷定歷史自氏族社會解體以後，便分向兩途發展：一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一是古代的生產方式；前者如中國及埃及屬之，後者如希臘羅馬屬之。這種主張，開端於普列哈諾夫，至馬札亞爾而集此說之大成。他以水的理論，說明中國在氏族社會以後，都是亞細亞社會；把中國的封建社會，無意中刪除了。這種史觀的危險性，必然會使中國反封建的革命實踐因而消失。雖然馬札亞爾後來會改正過他的錯誤；但日本法西斯走狗秋澤，就借重了他的舊話，歪曲中國歷史，說中國社會有特殊之停滯性，說中國社會之改正必須借重外力。這種荒謬言論，應當予以嚴正之駁斥。

反對馬札亞爾的理論，以亞細亞生產方法是馬克思在沒有看到摩爾根「古代社會」以前對於東方社會的假設者，有蘇聯學者哥德斯。他以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是東洋國家封建主義。這種見解也是錯誤。因為亞細亞生產方法這一名詞，馬克思不僅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上肯定說過；而且在「資本論」上也說過；同時恩格斯和列寧也不只一次提到過：足見有其實際內容而不是假設。況且哥德斯把亞細亞生產方法消解在封建制中；那末封建制的先行階段——古典制，究竟在東洋史

上，曾否存在過？仍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推論。

還有莫哈路斯基等人所主張之亞細亞生產方式，爲人類發展過程中之前階段社會一個獨特的階段。日本森谷克己、伊藤藏本、佐野利一等就支持他的理論；斷定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一種先於奴隸制的原始時代。這種見解，也是錯誤。因爲太拘執了馬克思的話，以亞細亞的在古代之前，一定有一個直接相續於氏族社會的階段。而不知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曾指出亞細亞的與古代希臘羅馬的是並列的一個歷史階段；又曾在「中國印度論」裏，說明這就是東洋專政政府；一切灌溉事業，都掌握在官僚的手中。

以上三種見解：第一種是過分誇大特殊性而忽略了一般性的錯誤；第二種是過分重視一般性而消滅了特殊性的錯誤；第三種是拘守公式不知變通的錯誤；只有後來科列諾夫在「古代社會論」裏說：『在古代東洋，即在奴隸社會的東洋，亞細亞生產方法是這等國家的奴隸制度的變種，即是灌溉國家的奴隸社會的具體形態。』雷哈德在其所著「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一書裏，更作有系統的說明。此說到了中國，經過華崗、翦伯贊、呂振羽諸學者的推討，認爲亞細亞生產方法，是相當於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之東方奴隸制的構成。這種說法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統一的

說明，是正確的結論。

次之，要說到奴隸社會問題，也發生兩種爭點：(1) 奴隸社會是否為歷史發展中之獨特的社會構成，抑或只是存在於階級社會各階段之一種副次的東西？(2) 奴隸所有者社會是整個世界史所一般存在着；抑或只是希臘、羅馬所獨有的一種歷史形態？這兩個問題，先有樸列漢諾夫、馬札亞爾等之社會進展二元論，否認奴隸制的一般存在；繼有哥德斯的機械一元論，把亞細亞生產方法消解在封建主義中，而蔑視奴隸社會在東方之一定存在。迄至蘇聯名史學家科瓦列夫、雷哈德等出來，纔認定奴隸制是一般存在的。中國歷史家華崗、翦伯贊、呂振羽等均依據其說，正確地指出中國奴隸社會是具有幾種特殊性：(1) 土地國有及中央集權：如殷商時代，由氏族長所支配的氏族土地也曾經轉化為國有土地；政權則表現成爲一種集權的形態。(2) 兩種形態的公社：如殷商時代，統治者殷民族自己的公社內部，則存在着奴隸制度，有奴主、自由民與奴隸的對立形態；在被統治者異族的公社內部，則仍保存原來氏族公社的組織；其原來的氏族長，一面又成了國家的稅吏。不過前者是主要的形態，後者是從屬的形態而已。(3) 治水和公共事業的國家負擔：如殷商時代對於黃河之遷避和疏通，都曾用過集體的力量。這樣的說明了東洋的奴隸制和其他一切奴

隸制一樣，只是具有其特殊性而已。

再次說到商業資本社會問題：自從波格達諾夫造出商業資本社會是歷史發展中之一個獨特階段之謬說後，又有波克羅夫斯基接踵其論調，把商業資本當作是俄羅斯歷史的中心。中國的法西斯走狗陶希聖抄襲其說：肯定中國歷史自秦至清爲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並以陶朱公、巴寡婦清、烏氏僕等商人爲佐證。這種謬論，顯然可以看出他是站在買辦資本階級立場上說話，顯然要想消解中國革命之反帝任務的實踐。要知歷史上之各個獨特的階段，都有其各個的生產方式爲其基礎；而商業資本並不是一種獨特的生產方式、只是負擔商品的交換關係。它的存在的條件，只要有貨幣與商品流通所必要的條件，就能存在。所以它不論在奴隸制、封建制以及資本主義制的生產基礎上，都可以存在。因此所謂商品資本不過是「社會物質的相關聯之諸要素的分離和對立之一般形態」。它的本身並不成爲一獨特的生產方式；而是歷史發展中任何時代所同有的一種附屬的因素。

固然我們不應忘記商業資本對舊生產方式所能引起之分解作用：譬如它可以「使生產向交換價值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使貨幣成爲世界貨幣。」但是我們要明瞭商業資本在歷史發展上也有其反

作用；譬如它在中國就和封建殘餘勢力結合着，而維持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剝削。

以上三個問題，都根據中國進步歷史家們的見解而簡略的解答過了。於是我們對於歷史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問題，更容易得到瞭解。

世界上各民族，在其歷史的初端，都會經過原始共產社會的階段。自從莫爾根從北美印第安人的現存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發現以後；接着恩格斯又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給以有力的補充；到了現在，差不多爲一般人所公認了。呂振羽在其「史前期中國社會」上，指出中國在殷代以前，有過很長時期的原始共產社會，翦伯贊在其「中國史綱」第一卷上，更依據發掘史料加以詳細的說明。從此可以把實證主義者所高唱的——「中國史僅從殷代開始」的謬論，打得粉碎無遺。即一批實證主義者的從屬們——疑古者的論調與夫消極論者之悲慘的歷史觀，均可以一掃而空。上古的合理的社會，即肯定的社會，確是一般性的存在着。

否定了原始共產社會以後，就來了不合理的階級社會——即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社會；這些社會之一的存在性，也爲進步的民族的历史事實證明了。在中國殷商時代是奴隸制社會。經過西周初期的過渡，從周宣王起，一直到鴉片戰爭，這一長長的時期，都是封建制社會。雖然中國社會還有其特殊性之存在，但決

不能因其有特殊現象而否定了中國歷史上之奴隸制與封建制。

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在中國是因為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使得在封建制母胎中行將誕生的資本主義，被扼殺而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這種社會型，既不能說它是封建制，也不能指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受先進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政治武力所支配而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以為在中國社會上，不能走上資本主義而就否定了資本主義一般的存在性。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當少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施行侵略政策的時候；許多弱小民族，抵不住它的侵略的力量，或先或後地被它隸屬與統治，變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不能獨立地完成其自身的歷史的發展。中國與印度正在預備由封建制進入資本主義的歷史行程中，被迫走入殖民地的慘運。又如阿比西尼亞還在奴隸制的歷史階段中，便被意大利的暴力所支配而轉入殖民地的過程。又如北美印第安人，還在氏族制的階段，就被白人剝殺其歷史發展的自由。這些現象都不能着重個別的觀察而懷疑歷史發展之一般規律性；應當認為這是歷史各階段發展的不平衡所致。

繼續階級社會之後，必然有一更高級的合理的無階級的社會。這由蘇聯之出現而成長而壯大，與夫世界各新民主國家之建立及各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運動之廣泛

展開，已可充分地證明這一規律性的正確了。蘇聯自建立之初，戰勝了國內的資本家大地主聯合而成的反動隊伍，驅逐了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環伺着的侵略武裝，以自己全體人民的力量，經三度五年計劃的埋頭苦幹；把過去沙皇時代所加於一般民衆的災害，幾乎完全消滅。因此引起全世界勞動大衆之反剝削運動與各弱小民族之大膽的反帝運動，更使得先進資本主義各國家間矛盾之加深與他們對蘇聯之仇視。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更以龐大無倫的全體人民力量，勵行戰後新五年計劃；把戰時的損失完全恢復；且已大多數超過了戰前的生產額。而蘇維埃主義聯盟的加盟單位，已由十一個共和國增至十六個共和國。蘇聯的版圖，從此大爲擴張。更有環繞蘇聯的各國，大多因受蘇聯之影響已經改變舊制而換上新民主的裝束，這使蘇聯的與國，更加增多。還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人民，也風起浪湧地掀開民族獨立運動。這樣使得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固有的各種矛盾，益發加深；而益發感到對蘇的嫉忌與恐懼。英美帝國主義集團，一面加緊向全世界勞動人民施行欺騙與壓榨；一面勵行反共反蘇政策。如「西歐聯盟」「北大西洋公約」與扶助日本法西斯參加中國內戰等，都是一貫的敵視蘇聯與世界人民的政策。可是因此反使世界人民更加堅強團結起來；世界革命的條件，更加成熟。這證明了一切民族和國

家，都有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走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更證明歷史的發展的規律性的正確。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中國，經過了八年的抗日戰爭與革命政黨的領導，使得大部分的人民都已覺醒，再不能忍受買辦資本、官僚資本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之剝削與侵害，而廣泛地起來作解放的鬥爭。此時反革命的勢力，雖然不惜出賣國家民族而求得美帝國主義之幫助；但因人民之堅決團結，已使鬥爭漸漸轉入有利於革命大衆一方面；帝國主義之幫助，也漸漸失其效用，中國人民革命之勝利已可操券而待，中國新民主社會——即消滅剝削制度之社會，已決定可以建設起來。

由此可知，人類社會歷史之發展，不論其特殊關係如何，決不能改易其必然的一般進展的法則。最初的時候，一定都有過無階級的氏族社會，這是歷史的肯定。繼着轉入了階級社會——即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便是歷史的第一個否定。因爲它否定了無階級社會。然而社會主義社會，又要否定階級社會；這便是否定的否定。不過這種作爲否定之否定的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原始的氏族社會之復歸，而是更高級的無階級共有的社會形態之建立。

第四節 歷史的變動性

在前面說到歷史的發展規律性時，已經連繫地把歷史的變動性也說過了；不過因為各階段所含的特質，還未說得明白；尤其是目前歷史界，對於中國周代尚有屬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兩種之歧說；雖然後者較前者已為多數人所承認而比較正確；但對於初讀史者，仍有指明各階段所含特質的必要。

再者質量的轉變，亦須加以詳細的說明。因為一般漸變論者，與循環論者，都想把突變的重要性抹殺了；這樣就可以灰暗了革命的情緒與理論。還有折中主義者，以折中的態度，取消了歷史上之矛盾的對立與統一的現象，使得歷史的變動，變成機械的與無意義的；使得革命的力量，也可以因折中而調和；使得反動的力量，也可以仍舊保存着。

因此我們儘先提出歷史上各階段——即原始無階級的共產社會、與有階級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最前進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段的所含的質的特性。

(一)原始共產社會之特質：是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制度，也沒

有國家組織的人類最初的共營共享的社會。這一社會的經過時期是相當悠久的；所以因進化上程度的高低，可分為蒙昧時代與野蠻時代。蒙昧時代的特點是(1)以石器骨器爲生產工具；以採集與狩獵爲主要的生產方法。(2)有兩性的及年齡的分工生產組織。(3)自雜亂婚進至血族婚，更進至彭那魯安的集團婚。野蠻時代的特點是(1)生產方法由生產工具的改進，——發現金屬器具——自狩獵進至畜牧；更發現了農耕與養蠶。(2)原始的部落轉變爲氏族的部落；氏族的最高權力機關是許多長老們所組成的會議；由會議中可以選出負擔軍事的聯邦司令員及管理各種事務的職員；同時有權收編異族的人們爲氏族員；有權處理氏族員間的爭執。(3)自集團婚進至對偶婚；更有進至一夫一婦制者。

在共營共享的社會裏，雖有了氏族長，但是由氏族公選，絕不像以後的皇帝；雖有分工的組織，但是生產手段與生產品均爲部落所共有，絕不是階級的分化。雖後來有交換形式的發現，但只是商販的雛形，決不像後來的獨佔資本的經營。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裏」說得很明白：『這種氏族制度在它的一切簡單的純樸性上，是如何地可以驚奇啊！這裏沒有軍隊憲兵及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知事或法官，沒有監獄和訴訟。大家都是自由自在生活着。一切爭議和衝突，

都是由他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共同來調解。祇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之下，才有復仇的極端行動發生。祇有現在號稱文明的國家，才把殺人當作文明。氏族社會的同事務，如公有的住宅為許多家庭所共享；土地屬於部落，只有菜園暫時屬於各個家庭。然而這些同事務，他們并不要如今日那樣龐大複雜的管理機關。各種要解決的事情，大家照着多少年來的舊習慣做去就是。顛連無告的窮人是不會有的——共產主義的家庭與氏族，都懂得如何去盡扶助老人病人殘廢者等義務。一切人都是由平等的——女子也包括在內。此時尚無奴隸，也無壓迫和剝削的事情發生。在人類社會沒有分化為階級以前，情形就是如此啊！

(二) 奴隸社會是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分裂成兩個階級的社會。它的特點是(1)以奴隸主與奴隸為社會基本階層；還有不重要之獨立生活者——自由民。奴隸負生產之全責。他們是等於牛馬——可以任奴隸主之鞭打或殺戮。奴隸主則完全脫離生產勞動。他們可以驕奢淫逸；也可如意地從事一些精神的生活，如藝術等。自由民是自由的小規模工業或農業生產者；但大多因奴隸生產的競爭以及戰爭的負擔而流為窮困者。(2) 生產工具已進至青銅器或鐵器。生產技術與生產量也較前期提高。不過所有的生產手段——土地與勞動工具及生產工作者——奴隸，均完全為奴隸主所私

有；生產品亦均為奴隸主所獨享。(3)國家之組織已實現。雖然形式上可分為君主制共和制等，但國家的實權均操於奴隸主，而奴隸則只是奴隸主的工具，沒有絲毫權利可言。(4)較大的商業經營已經廣泛地出現。(5)男女兩性間之配合已確定了一夫一婦制。

在奴隸社會裏，沒有共同自由的勞動了；也沒有生產資料與生產品的共享了；只有奴隸主對奴隸非常厲害的剝削。社會上於是裂開了兩層階級，更引起了殘酷的階級鬥爭。這就是奴隸社會質的表現。

(三)封建社會是繼續着奴隸社會的階級社會。它的特點是：(1)以自給自足的自給經濟為經濟基礎。(2)以封建地主與農奴為社會基本階層；也有獨立自由生產的自耕農及自由工人。地主佔整個土地的極大部份。農奴由地主方面領得土地，以自己的或租借的生產工具——農具牧畜等——去耕種。自耕農及自由工人受大地主或商人之經濟競爭及政治壓迫，大多數流為乞丐及流氓。(3)生產工具較前期進步，已大量地使用鐵及精鍊之鋼；生產技術及生產量亦隨着增高。(4)地主把農奴固定於土地上，使農奴沒有行動自由；使他們個人屬於地主自己。地主對農奴徵租地租或採取力役地租及後來之貨幣地租等。但農奴在名義上已有法律保障其不受地主之殺戮。

(5)封建制國家之組織，雖有分封與中央集權的分別；但統治者均屬於地主階級；農奴只是被統治被壓迫的階級。(6)商業較前期更爲發展；由行商進入坐賈；有商業城市發生；有工業行爲組織。(7)仍維持不平等的一夫一婦制。

封建社會在形式上看來，已較奴隸社會爲進步。但地主對於農奴之剝削仍非常利害。所以兩階級的鬥爭，也仍非常尖銳。

(四)資本主義社會是從封建社會內誕生出來的一個最後的階級社會。它的特點：(1)以自由商品生產，自由商品流通爲經濟基礎。(2)以資本家與勞動工人爲社會基本階層；間有自由獨立生產之小規模工商業者。資本家擁有極大多數之生產工具；但不以勞動工人爲私有。勞動工人則出賣自己勞力，把自己也變成商品。小規模之工商業者，禁不起經濟競爭，大多流爲無產者。(3)生產方法已進至蒸汽機及電氣的大規模集體之工業生產。因生產之競爭，使得生產力漸漸集中。又因商品之無政府性生產，使得商品剩餘。(4)資本家無厭足的剝削工人之勞動剩餘——利潤；使得工人日形窮困。又因生產工具之繼續發明與生產競爭、商品過剩等現象聯結起來，使得生產萎縮，工人失業。(5)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制，雖號稱自由平等，但資本家享有對勞動工人剝削之權利；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殖民地人民，仍有不平等之殖

民制度。這顯然是自私的階級的社會，所以仍然有劇烈的階級鬥爭。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因為生產力的集中，生產品的剩餘，與勞動工人之失業，使得資本主義間競爭益形激烈。從此資本主義更走上了含有侵略壟斷的性質的帝國主義階段。但是帝國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後期，它與資本主義是同質的社會。

(五)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定了階級社會，重建無階級社會的一個社會階段。它的特點，可以用蘇聯的現象來說明：(1)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2)蘇聯國家的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是公共所有的，其中雖存在自力農民及手工業者之小規模私有經濟，但絕無剝削他人勞動之形態。(3)蘇聯之政權屬於全蘇聯之勞動人民。(4)蘇聯的人民不分男女，均享有法律保障之自由權：即言論、出版、集會、游行及示威等自由。

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內既無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所以蘇聯國內絕無階級鬥爭等情事。又因蘇聯國內大規模之生產事業均屬於國家，所以又無資本集中與商品剩餘、工人失業等現象。蘇聯國家以獎勵競爭等方法，使得生產力突飛猛進；以國家的力量供給科學家以充分研究之材料與行動之便利，使得科學有驚人之進展。這都是因

爲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最高度最先進的合理的社會；決非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望其項背。

無奈資本主義各國畏懼社會主義之成長，盡量用誣謗毀詆等手段來打擊蘇聯。所以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國家；說蘇聯的人民是不自由的；說蘇聯的科學是不能前進的；說蘇聯的政權是操於少數人之手的；這些完全虛構的言論，可以拿現實來證明它的卑鄙的與無恥的捏造。

前面已經把歷史上各階段之特質，簡約地說明了。接着就要說出質量的轉變以及矛盾的對立與統一的法則。

歷史上各階段的量的增加，促成了質的轉變，同時質的轉變，更促進了量的增高。氏族共產社會時期的生產力是如何的薄弱啊！生產量是如何的渺少啊！經氏族各集團的共同努力，才能維持各氏族員之溫飽。雖然後來生產量漸漸增加，但還是不能使大部份人脫離生產的可能。直到奴隸社會便不同了；在奴隸社會時期，生產力已較前大增。它可以使得一部份人——奴隸主——脫離生產而任意享樂，也可以使得生產品多量堆積在不事生產者之倉庫內；更可以使得生產者不從事生活必需品之勞動，而從事奢侈娛樂的勞動。這是質的改變也是量的增加。到了封建社會時

代，生產力比前期更進步。這時期有大量財富蓄積之地主；有巨大資本之商人；一切生產量都比前增多了。再到資本主義社會，那更是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遠非前期保守經濟所能及。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量只是限於資本主義性的。它決不能與更前進的社會主義社會比長量短。顯然蘇聯的生產力的進展，一定會超過資本主義各國，這是無可疑議的。

質量的轉變，不僅從生產力上表示出各階段的不同的增高；即自其他形態看來，也沒有不隨着質的轉變而增大其量。再就破壞性的戰爭而論：在氏族社會時期所發生的氏族間的鬥爭；所用的武器，只是石塊和木棍；所集的軍隊，只是數百人或千餘人；戰爭的狀態，只是相互投擊或肉搏而已。至於奴隸社會時期所發生的國家間的征服鬥爭與階級鬥爭，就與前大不同了。此時有弓弩戈矛之使用，有可能調集數萬人或數十萬人之軍隊，有「流血漂杵」「殺人盈野」的慘痛。遞至封建社會，則戰爭形態更爲加大；金屬的武器更爲銳利；所用軍隊有多至百萬餘人的「圖水之戰」；殺傷之慘，如南北朝時代可使兩淮一帶歸燕無屋可巢。進至資本主義時代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其戰爭之烈，牽涉之廣，殺傷之多，更超過封建時代的任何戰爭，何啻幾倍。最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性質與第一次大戰已有差異。第一次

大戰，只是資本主義間之衝突鬥爭。而第二次大戰，則加上無階級社會的蘇聯；其意義是民主國家與反民主國家的鬥爭。因為這一含義的不同，使戰爭的量也起了變化。在第二次大戰裏，幾乎全世界各民族都已參加。戰火所燒着的地方，幾乎遍及各洲。殺傷及災禍之慘，單就蘇聯一國論，已無可計算。這可見戰爭狀態，也隨着各階段社會的轉變而增大。

於此須要鄭重說明的，戰爭的事實，只有在階級社會各階段中表現得最殘酷。在最初無階級的氏族社會裏，雖然有了戰爭，其規模是很小的，將來如果到了全世界各民族轉入社會主義的時候，消滅了階級間的仇恨；那末這殘酷的破壞的戰爭，也要隨質的轉變而消失。

質量的相互轉變，並不是機械的發展；而是相互推動，相互制約；這是因為歷史進展的法則是矛盾的對立與統一。當氏族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有些氏族員或家族聯合的農村公社，擁有私產的時候；於是氏族社會關係與生產力就發生矛盾。由於私有生產形態之逐漸擴大，矛盾也逐漸增加；氏族員間也發生了貧富的對立；使得氏族社會必然趨於崩潰，而突變為奴隸社會。這是矛盾的統一。當奴隸社會成立之初，生產關係可以推助生產力向前順利進展。但立即又發生矛盾；奴隸主想盡量

支配整個的生產方法，而奴隸則為獲得自己的生活條件，必然起了對立。因而影響生產力之萎縮，更因此交互影響而使社會之矛盾益深。還有統治種族與被統治種族間之矛盾；奴隸主本階級間之矛盾；相互連繫而使奴隸社會趨於解體，突變為封建社會。這又是矛盾的統一。當封建社會關係初建立時，與前期一樣地得到便利之進展；但也一樣地立即發生矛盾，發生多方面的矛盾，結果也必然地因鬥爭而解體，突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這又是一次的統一。資本主義雖然是階級社會的最後一段；雖然它自己宣傳得如何文明；但它的內在的矛盾發展得比前階段更厲害。當資產集中到少數集團之手的時候，一大部份勞動工人已陷入失業飢餓的陣地；一部份小資產階級也走入窮困之門；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商品剩餘，生產力反因而枯萎。於是資本主義國家，有了四方面的矛盾：(1)資本主義國家間之矛盾。(2)資本主義與勞動階級之矛盾。(3)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之矛盾。(4)因為世界上有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於是有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間之矛盾。這樣地在矛盾衝突中發展開來，必然地要使資本主義崩潰而突變為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歷史發展規律中最進步的一次的統一。

但是變動的過程，並不是一般的而是有其特殊性的。譬如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社

會，特別發展得緩慢而悠久。許多王朝的興廢，表現得有些近似的方面，以致一班反動的歷史家，遂目為歷史是循環的或是不變的或是停滯的。其實中國歷史並沒有停滯不動或循環。它是像螺旋地發展着，它仍然是一代一代地變動而前進；而且進步到封建社會的最高階段。不過正將突變為資本主義的時候，就被扼殺了而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種社會的質，既不是完全封建制度，因為它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從屬者買辦資本；已經在許多空間上，破壞了封建的組織。但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它沒有獨立的可以與世界資本主義競爭的民族資本家；只是一般附屬於國外資本家的買辦資本。而且農村的封建性，仍被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所利用，而予以箝制困守，使無法脫開。這種社會關係與生產力所引起的矛盾是雙重性的：一面是反對保守的封建性；一面是反對侵略的帝國主義。中國在最近幾十年中間，發生了無數次的革命鬥爭；大多是針對着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目標。現在的新民主革命，更其明白地揭出宗旨：中國必須消滅封建地主及帝國主義走狗官僚資本的勢力，建立新民主政權，發展國家民族資本，使得中國社會可以走上無階級的社會主義之路。

反動的歷史家要說中國目前還是封建社會，必須再來一次資本主義性的變革，

這是荒謬絕倫的言論。要知歷史的發展到了目前的階段，已經是世界交流，行將統一的時期。不但中國的社會要飛躍地進展而過渡到社會主義之路。即更落後的民族如阿比西尼亞，如美洲印地安民族，也可能因為這次世界革命潮流所造成，而一同的成爲社會主義的一分子。所以硬說中國必要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變革，這分明是要使中國永遠做了帝國主義的附庸；要使中國的人民，陷於永不超昇的地獄。

更有說中國目前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須要像蘇聯的社會革命；這也是荒謬的。因爲中國目前的社會，還是遠不及蘇聯革命的前夜。中國還是大部份沈浸在封建的氣氛中；一切生產力還非常幼弱。所以在中國進行新民主的革命，這是絕對的正確。

極右派忽視中國社會的買辦資本從屬性，與極左派抹殺中國社會的封建性，都是一樣的想爲目前的反動派政權說話，想消滅中國新民主的革命力量。我們讀歷史的，應該比任何人看得清楚，比任何人的意志來得堅決。我們應當實踐我們的理論去和敵人奮鬥。

第五節 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在人類活生生的實踐行動的進展中，貫串着千千萬萬的偶然變動的事情，而連成了有規律的必然的整個的歷史。

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是須要認清的：偶然性不是獨特的形式；它只是必然性的一個發現形式及其補足。但又不能把它混入必然性中而毫無差別。偶然性也可說是必然性的契機；但是沒有失却本質意義的契機。這種契機如果增高起來，增高到一切條件都具備的話，那它就會成爲必然性。

有些觀念論的歷史家，把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分裂了硬化了。認爲可以理解的事情，有法則可循的事情，都是必然的；否則都是屬於偶然。那末偶然與必然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相混淆地存在着。這樣的說法，只有把必然性歸結到自然的人爲的；把偶然性歸結到超自然的天神的；而把整個的歷史送入二元論的區域了。

更有機械論者把歷史的必然性解釋爲歷史決定論。歷史只有循必然的規律進展着，沒有什麼偶然性；一切的偶然都是必然的因果所惹起的。這樣的說法，把歷史塑成定型的宿命論，把歷史仍然會送進神的懷抱裏去了。

馬克思曾對偶然性作過正確的解釋——他說：『假若偶然性什麼作用也沒有的話，那麼世界史的性質就非常神祕了。偶然性的本身，自然只是發展的一般行程的

一部分，並且會被別的偶然性所抵消。但對於事情的促進或遲延，偶然性却有很大的力量，而在這偶然性裏，最初立到運動陣頭上來的人的性格上的偶然，也是有着作用的。『恩格斯致羅布荷的信上也說過：『必然的東西……是通過了偶然性的無限的集合，來開闢自己的道路。』這些都是說明了偶然性與必然性在辯證的發展中，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相互轉化而統一着的。比如歷史上發生偶然的交換，這件交換的事情，是仍然被生產力的發展制約着的。惟其有了偶然交換之後，更反復地經過了愈多次，就愈成爲歷史的必然性，成爲社會存在的決定條件；且因此使得氏族社會解體，使得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布爾喬亞社會爲之崩潰。又如歷史上工資勞動，最初偶然發生了以貨物換得了勞動力。但這種工資勞動的發現，只有跟着奴隸社會才成立的。惟其成立以後，工資勞動就轉變成歷史的必然性。生產勞動者對於支配生產方法的主人，偶然起了抗爭；這也是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所引起的。惟其引起以後，接連地不斷發生，遂形成了勞動階級必然性。

再者，中國歷史上有些偶然發生的事情，每爲封建歷史家們所誇大爲神跡者：比如戰國末年，偶然產生了秦始皇；又偶然沒有被荊軻刺死，因而激怒了他，立即滅掉了燕；更滅齊而統一中國。這好像秦之併吞六國，可能因爲沒有秦始皇，或是

被荆軻刺死而消失了。但秦國之所以能富強，能戰勝六國，是因為秦國為商人地主之堡壘。在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上，說明了六國的舊封主制度，勢必為新興之商人地主所執行之王權集中制度所代替。秦始皇固然可以沒有，也可以被人刺死；而秦國必然會有另一個始皇出來替代；六國仍然是要滅亡，舊封國制度仍然是要改變。不過因為有了秦始皇及刺而未成的事情，促成了六國的早日覆亡而已。又如陳勝、吳廣之偶然揭竿起事，使得叛秦者蠡擁而起，卒以此而覆滅秦社；這也是偶然的一件事。不過沒有陳、吳之揭竿，也會有人叛亂的。因為秦朝的社會關係已到極端矛盾的時候，被壓迫者一定要起來反抗的。歷代王朝的崩潰都有了偶然的叛亂，而積成了必然的叛亂的匯流，卒以此而顛覆了統治者的寶座。又如清末有了孫中山；而孫中山又偏是廣東人；他起來領導革命，又沒有一次被滿清政府所捕殺；這也都是偶然。但即使沒有孫中山；即使孫中山被滿清政府捕殺；而反抗滿清的革命，仍然不會消失的。

所以在歷史上，我們認清了偶然性能促進或是延緩了必然性的發展；但不能過份誇大了偶然性；或是把偶然性孤立起來與必然性不相連繫了。我們更認識了必然性中有無數的偶然性貫串着；但不能固定了必然性，而完全無視了偶然性。

近來有些反革命的法西斯御用學者，更利用歷史的偶然性，加以宣揚擴大，爲帝國主義張目，爲統治者發揮暴力作用。如說這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結束，完全靠美國原子彈的力量。若非美國原子彈早日成功，日本決不會無條件投降；世界的禍害，還不知伊於胡底！由這一理論的推開，就可以進一步說，美國的保守原子武器的祕密，也是應該的；世界弱小民族對美國的服從，也是合理的。這種宣揚暴力的言論，完全依據歷史的偶然性說法。要知法西斯軍隊之敗亡，是必然的。即無原子彈的成功，而蘇聯之快速自滿洲進兵，已使日本非降不可。即使美國永遠保守原子彈的祕密製造，也不能阻止世界反帝國主義革命之浪潮而使之不繼續發生。法西斯宣傳者之荒謬言論，非但毫無理由，而且無濟於用。

反之，我們決不應完全埋沒了偶然性而固定了歷史的必然性；更因此而忘了實踐的意義。比如說：目前中國新民主革命是必然會成功的；那末就等待着它成功吧。這樣的期待的心理，不肯去實踐革命的心理，都是錯誤的，等於反革命的。因爲歷史的必然性雖然告訴我們：中國的法西斯政權一定要覆滅；中國的新民主革命，一定會成功。但是偶然的人爲力量，也是不可忽略。比如目前革命的進展，若沒有領導者的偉大能力，可能也起了遲緩的作用；若沒有其他革命人士的輔助，也

沒有如此廣泛的作用。目前的革命，只有全國一致地向前爭進。倘使固執了歷史的必然性而忽略了偶然性的作用，那便成爲不實踐的空論者。

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統一與相互轉化，已經解釋過了。現在又恐怕還有人要懷疑「偶然的發生的現象，是不會有因果關係」，特加以重復的說明。要知在歷史事實中，沒有一個現象是不相連繫的；即沒有一個現象是脫離因果性的。所以偶然性也正有千千萬萬的原因及條件連繫着。這些原因條件就像千絲萬縷般聯繫了宇宙的全體。不過突然看來，有些偶然性似乎是沒有什麼原因和條件而獨立出現的。但我們須知道偶然性仍然是客觀存在着的現象，那末決沒有孤立無因的偶然性了。

況且唯物辯證法的因果學說與機械的因果論相距很遠。機械論者不知道各現象的整個聯繫及相互交錯。他們看見某一個現象是因，繼着發生的某一個現象就是果。因與果只是一種外在的僅僅一次的關係。原因不能變爲結果，結果也不能成爲原因。這樣的把因果當作規律性的公式去觀察；把一切事物都孤立地僵化了。而辯證法的因果觀完全不同；它不把因果關係看作機械的因果形式；不把因與果的關係當作外在僅僅一次的關係；而是當作內在的互相連結的關係去理解；還要理解從原因到結果，從結果到原因的辯證法的轉化。所以辯證法的因果觀，可以把歷史過程

的實在的規律性非常深刻豐富地反映出來。這樣的因果性，不外是必然的一般規律性的形式之一吧了。

第三章 論中國史籍及史料的閱讀方法

第一節 論神話傳說及偽書的應用

一、神話與傳說

翻開羅泌「路史」及馬驥「釋史」等一類集輯而成的古史，甚至「正史」或「別史」等所載周以前的歷史，大多可說是荒渺難稽的神話和傳說。

神話和傳說的來源，不外三途：(1)古代人類在平常或特殊的生活習慣中，由激動之情緒所引起之傳說。(2)中國古代會經過很長久的共營共享的無階級的氏族社會，後來雖轉變到階級社會；但人類對於前一時期美滿的社會生活，還是由故老的傳述，覺得非常可以留戀與想像。因此除原有的傳說外，更添造許多美妙的神話。(3)春秋戰國以後的學者，為宣傳自己的學說起見，可能添造許多古代帝王的言行，以證實自己理論的真實。這種添造的傳說，以道家為最多。這三途來源所造成的三種傳說：第一種雖較確實，但年代悠久，輾轉傳誦，或已失其真相，或僅留其梗概。第二種添造之傳說，必然誇大傳會，亦難適合本來面目。第三種更為作書者任意造塑，最難憑信。

但是傳說也不是完全不可憑信，或是完全無用的史料；因為它至少還留存着先民時代的風俗習慣的模糊的輪廓；它雖然經過悠久的傳述或擴大，甚至有些是有意僞造；却也不能因此而抹殺其少數之真實性。

封建時代的歷史家們，大多數迷信傳說，認為這是真實的歷史。因為這些傳說的大部份，都是褒揚古代帝王的聖蹟，最適合於統治階層所利用以誇大王權之神聖不可侵犯。更因這班御用的歷史家們，自己也需要把史實擴大僞造，為確定自己添造之真實，更須無條件地接受其他同類的僞造。總之，封建歷史家們的迷信傳說，是與封建社會機構中的上層階級諸形態相適應的。

疑古歷史家們，對於傳說，完全懷疑；甚至完全放棄不用。所以說中國歷史，只有自周代開始，所引用的古書，只有「詩經」最可靠。這種疑古的態度，是與當時的新興的資本階級的意認相適合的。所以他們正表現着反封建的意識，即反神話傳說。他們不管傳說之有否可用，中國先史時代之應否研究，均可置諸不問。

我們讀史，應當以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去從事研究。封建歷史家之迷信傳說，被資本階級歷史家之懷疑態度所否定了。現在我們更要否定了懷疑派的作風。因為目前地下發掘的許多古代人類的文明遺跡，漸漸充實了歷史界對於先史時期研究的資

料；我們以一般的歷史發展的規律，去研討地下發掘出來的史料；從此更以傳說去作旁證，自然會獲得進一層的明白的解釋。不過利用傳說作旁證，並不是完全迷信傳說；而是靈活地去應用它。有人說這是信古派與疑古派的折中辦法，也是錯誤。我們並不希望為兩派調和或折中；而且完全否定了他們兩派的治史方法，另用辯證的唯物的方法去研究。不過他們所造成的歷史的成果，我們還是要來享受應用。

比如傳說中之有巢氏構木爲巢，燧人氏鑽木取火等傳說，已由慕爾根之「古代社會」及中國各地發掘出之地下史料，證實其確非虛語了。又如說古代人類「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及「男女雜游」等傳說；亦由歷史發展必然之規律，認爲中國古代必有這一雜亂婚的時期；子女的養育，當然由母獨負。至如說炎、黃之世，百姓熙熙；這可以爲古代氏族社會無階級的剝削之旁證。又如唐虞禪讓，「萬邦協和」等傳說，可作古代聯盟部族公選部族司令員之象徵。再如「百獸率舞」，及有熊、有虞等氏族稱號；可想見中國古代各民族，亦和北美土人一樣有圖騰標幟及圖騰舞等。這一類可以用作旁證的傳說，在中國古籍中，還是非常豐富；只不過要我們合乎法則地去採集應用而已。

二、偽書

說起偽造的書籍，它在中國古老的書庫裏，佔據着很大的場合，它與其它的古籍，撲朔迷離地糶雜着，但大部已經歷代的考據家考訂出它的真面目，而明白地宣佈爲偽書了。偽書既經完全審明，是作者有意構造。那末它似乎毫無價值之可言，我們讀史者爲什麼還要利用它以爲研究歷史之一助呢？

因爲偽造的目的，不外四點：(1)作者深恐自己的學說，不能取信於人，因僞託古人以自重。這一類的僞書，如「內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等，可爲代表。(2)作者爲取得帝王的信託；或爲自己官場進身計；因僞造古書，以迎合帝王的心理。這一類的僞書，以「周禮」與「緯書」等爲代表。(3)爲加強自己學者的地位，因作僞書以顯示家派之淵源。這一類的僞書，以「尙書孔傳」「詩序」等爲代表。(4)專爲馴服民衆以鞏固統治者的地位。這一類的僞書，以「忠經」「孔子家語」爲代表。

依據以上四點所構成之僞書，若既經證實，確是僞書；幷已考證出作僞者之姓名及時代，那末讀史者正可應用它爲歷史資料了。因爲我們讀僞書，並不把它當作被僞託的時代的書籍，而且把它變爲原形了的作僞者的時代的產物。這樣一來，正可從僞書裏看出僞作者的社會意識，與當時的社會機構。比如說：「山海經」不是

夏禹的作品，而是戰國末年的產物；我們就可以在「山海經」裏發現當時知識份子，有如此離奇幻想之地理觀念，正與騶衍之九洲說，同屬一類的典型。又如「周髀算經」，我們知道它不是周公所作，而是周末的算書。「內經」不是黃帝與歧伯等談醫的筆錄，而是漢代醫生的偽託。由此就可以證明，周末的算學和漢代的醫學，是達到如何的程度了。又如「緯書」，既不是真的孔丘遺跡，而是西漢末年，官僚階級所偽造。正因為偽造，就可以看出當時一般官僚階級的無恥地趨迎帝王而欺瞞羣衆。「周官」既確定是劉歆輩所偽造，就可看出劉歆輩的意識：一方面是迎合王莽好高務大託古改制的心理；一方面希圖以理想的封建初期的政制，改良當時矛盾迭出的社會。至若「孔傳」「詩序」等偽書，顯然是要想與今文派爭學術的權威；顯然是魏、晉間統治階層分裂之象徵。「孔子家語」既然是王肅輩所偽造；這分明是統治者的代言人的真實說法。忠孝二字，又是封建社會上層階級欺人的道德了。

並且偽書不僅可以看出作偽者以及當時某一階層的意識；而更可以利用偽書內所引前時代的傳說，而增加研究歷史之資料。這種史料的利用，與神話傳說是同樣的。

僞書倘未經考訂明白，那就非但不能利用，而且可能被它所誑騙。幸靠中國辨僞之學，自漢鄭玄開始到了現在，差不多已經近於完成。其中如明胡應麟「四部正譌」，清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崔述「考信錄」，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以及最近顧頡剛主編之「古史辨」等，皆爲有名的辨僞作品。我們儘可因此而認識古籍之真僞與作者的時代。不過這些先人們所完成的歷史事實，固然可以接受；却不能完全盲從地去接受；還是要用辯證的方法去辨認。比如「周官」雖是劉歆僞造；但劉歆在僞造時，應該參考過許多周代古籍。現在我們研究到成周的政治形態時，既從金文上或真實的史料上已經得到真確的論據；更不妨從「周官」中檢點其有否同態的記錄，以作旁證之助。又如「山海經」雖是周末人僞託，但書裏儘多古代民間傳說，我們正可以靈活的方法去利用它。

還有真實的古書中，仍然有不可靠的贗品：今文「尚書」內的「典謨」，顯然不能信爲虞、夏間的作品；而僅能當作古代的傳說。「管子」「商君書」等，雖非僞造；但決不能作爲管仲、商鞅所撰，而僅能以之作探索先秦政制之助。總之，我們對於一切僞書，或似僞非僞的書，皆應審慎考察而後可。

第二節 論正史讀法

說起讀中國史，人們便會問你：「看過二十四史否？」好像二十四史不但是讀中國史的人所必須閱讀，而且作史者也必須以此爲法則。

其實，這不過是封建歷史家們的語調吧。依現在科學的眼光來觀察二十四史，即所謂正史（清四庫全書史部內所列正史，有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史」，「北史」，魏徵「隋書」，劉昫「舊唐書」，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元史」，張廷玉「明史」，現在有人再把柯劭忞「新元史」及趙爾巽「清史稿」合進去，可稱二十六史）。它的內容，非常複雜；它的體製，又不盡合規律，而且有不可靠的地方——即是「有意的歪曲」與「無意的錯誤」二項。

先就有意的歪曲來說吧：因爲這一部「正史」的作者，大多是貴族及商人地主階級；或是統治者御用的史臣。他們的作史，是本着固定的階級的意志；只有讓歷

史來服從他們的意志，決不會讓他們的意志去聽從歷史。這樣一來，歷史就脫離現實而聽任他們歪曲了。茲把他們歪曲歷史的用意，約述二點於下：

第一，是尊君抑臣的主旨：正史記載帝王的事實叫做「本紀」；記載貴族諸侯的事實叫做「世家」；記載官僚商人地主的叫做「列傳」。帝王是最尊崇的統治者；所以在「本紀」裏，只有尊崇的諂諛，沒有詆諆的批評。倘使實在沒有可以諂諛的地方，那就要添造奇跡：如劉邦之生，出於神龍之附體；劉秀之王，有赤符自天而降；其餘慶雲、甘露、嘉禾、寶鼎等紀瑞之象；都要替帝王加添上去。至於帝王倘有過錯的地方，必然諱莫如深。但帝王也有分別；開國的帝王，自然只有善政而無錯事；反之，亡國的帝王，却不免有遜德。原因是亡國之君，若仍然只有善而無惡；那末繼起的聖君，如何可以承受大器呢。固然歷史家還有一套說法，說什麼「五德終始」，「天運相承」。如秦之繼周，漢之繼秦，都有五德相承的道理。再者明明是篡奪，也可解作禪讓的盛德。如記載魏文、晉武、宋武等事，都是一類的筆法。這樣既可以替本朝皇帝爭光，更可為前朝亡國之君掩護；一舉兩得，豈不懿與善哉！

「正史」裏寫到「世家」或「列傳」，那就與「本紀」有些不同。這是應當降

一級看的；是以可褒可貶。不過褒貶的方法，仍以帝王為尺度：順從帝王的臣子，為忠臣，為美德；反抗帝王的臣子，為叛逆，為亂賊。忠臣的事業，儘可恢張擴大，用以勉勵將來，用以示範於羣下；叛逆的行爲，亦不妨任意裝塑，使叛跡益彰，使繼起者有所戒懼。唯其如是，乃所以尊君抑臣。至於事實是否歪曲，似乎不須顧慮。

「正史」裏沒有替一般下民作傳者，因其過於卑下，不屑污史家之筆。只有司馬遷曾替「貨殖」「游俠」「日者」作過傳；這可算得是特殊的史家了。還有一些平民革命領袖，曾經做過轟動一世的革命事業，使得王朝幾乎崩頹；或因此竟至覆亡；於是正史的作者也不得不錄。但必須看他本人，有否稱帝稱王；若沒有上過尊號，即使事情如何重大，也只好附記在他的傳內；決不能為無名之叛逆獨立作「傳」。赤眉、銅馬、黃巾之流，自然沒有「列傳」的可能。他們的行爲和人格，不論如何為民衆所擁護，如何光明正大，也只好為了尊君抑臣的主旨，而把他一切都埋沒了吧。

第二，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思想：這種思想，與其說是狹義的民族思想，反不如說他是唯君主主義的王族思想。一部「正史」，都是以帝王的種族為中心；其餘各

種族，都在藐視之列。晉代以前，做中國的帝王都是漢族人；所以作史者特別尊重漢族——自稱曰大漢，稱各民族爲夷爲戎爲蠻爲狄，或以禽獸蟲豸之名稱之。晉代以後，外族恆入主中原；於是作史者就立刻對其統治者之種族，表示尊敬。唐代之修「北齊」「北周」諸書；宋代之修「五代史」；對異族之君，均極其推崇。遼、金二史，主修者係外族人；其尊崇他族，固無足怪。而明、宋濂以漢人修「元史」；乃竟忘其民族之仇恨；而竟以忠元者爲忠臣，叛元者爲亂賊；是則毫無民族思想之可言。清朝以滿族統治漢族，而漢族之史臣，甘爲滿族奴隸；不但尊崇清帝爲神聖；連清帝同族之遼金諸帝，亦在崇敬之列。趙爾巽在清亡後，編修「清史」，此時已無政治之威脅；乃猶戀戀於舊主饑饉之惠，不屑自卑其族而尊崇滿族，謂太平天國爲髮匪；義和團爲拳匪；指民族革命領袖爲匪首；稱滿族之統治者爲聖主；如此卑污無恥之思想，其所纂修之史籍，必然不能悉依事實而無所乖曲。是知一部正史，除了帝王的種族詳爲記載外，其他種族，或言之不詳，或根本不言。至其與中國交涉頻繁而不能不稍爲記述者，則捏稱爲帝王之後裔。如匈奴爲夏桀之後；朝鮮爲箕子之後。如是則可稍表優異，以示與其他種族不同。並且「正史」內所記與外族交涉之事，均自大自尊；中國向外族納貢稱臣，必曰「賜與」或「懷柔」；外

族使者或商人之來中國，必曰「朝貢」，曰「來王」。中國侵略異族，則曰「征討不庭」；異族游牧邊塞，則曰「入寇」。中國與外族有戰事：中國敗，則曰「失利」；外族敗，則曰「寇潰」。中國使臣在外族或受羈縻，則必揚言如何秉節不屈；如蘇武之事。中國官僚在外族殘殺人民，則必諱言「宣揚國威」，或「懷服異族」；如班超之事。異族軍帥驕橫，凌辱中國，反自解爲受撫；如唐、回紇之事。統治者爲人民所逐，乞援異族，則解爲來會王師；如李克用之事。他如南朝宋、齊、梁、陳諸「書」，與北朝魏、齊、周諸「書」；「宋史」與遼、金二「史」；所載同一事實，而彼此互異；這顯然都是尊己族而卑異族的緣故。總之，封建時代的史家，其思想是狹隘的，是偏於一方面的；明是歪曲，必曰秉筆直書而已。

以上二點，是史家歪曲歷史之最大原因。此外還有微小的原因四種：其一，爲當時政治所限制。作史者雖欲據實下筆；實因忌諱多端，不能不有所遷避。尤其是開國皇帝的實錄，只有諱言其惡而頌揚其功。班固身居漢世，其撰「漢書」，不得不頌揚漢祖。陳壽、晉人，其撰「三國志」，不得不帝魏絀蜀；更不得不諱言司馬懿奪之事。這是作者明知故犯，以致史實失真者。其二，爲史家例法所拘。「正史」之作，都要效法「春秋」，方爲得體。「春秋」有「經」「傳」，「正史」有

「紀」「傳」；「本紀」是綱，「列傳」是目。但「本紀」必從帝王而成；苟無帝王，如何能成「本紀」。所以正史作者必定要找定帝王，纔能成史。職是之故，勢必不顧前後之矛盾；只要有帝王就好。於是前代之亂賊，不妨爲後史之帝王，如朱溫等是。前代之逆臣，不妨爲後代之聖君；如朱棣等是。更有一時而數君者，則必效「春秋」一統之旨，擇其一爲正統，其餘爲僭僞。「三國志」之帝魏；「五代史」之帝梁、唐、晉、漢、周等皆是。至若「春秋」書災異以示警，「正史」內則有「五行」「天文」等以志天變。於是興國有降符、獲麟、鳴鳳之瑞；亂世有黑氣、黃霧、白虹之妖；怪誕異說，隨意而成。這些也是有意把史實弄得模糊了。其三，爲傳世行遠的虛榮心所祟。如司馬遷之作「史記」，已有「藏之名山，以俟後世聖人」之用意。此後陳壽作「三國志」，用筆力求簡鍊；歐陽修重修「唐書」「五代史」，刻意爲文。以爲「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力求文之工，則史事必有所不顧。其四，爲勢利所動。如魏收之作「魏書」，專以勢利變更事實；世謂之「穢史」，亦非過當。他若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班陳以名史家，而尙如此，其他則又何說。凡此四種，雖非一般如此，亦爲造成正史歪曲之端緒。

再說無意的錯誤吧，大約也有二點原因：第一是抄襲的錯誤；因正史的作者，

大多抄襲前代的王朝實錄；少數是根據其他史書。前書既誤，抄本自然因誤傳誤。這在作史者，固有所不知；而貽誤則一。如「南史」與「南宋」「南齊」「梁陳」諸書；「北史」與「北魏」「北齊」「北周」諸書；所載互異。「宋史」與「遼」「金」二史，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彼此不同。這顯然是抄襲前書，毫不加以考訂所致。明宋濂等奉敕修「元史」，不及一年而成書；所載事實，悉抄舊日官書檔案；加以蒙古文與漢文互異，語音又別；以至乖謬百出，為過去史家所詬病。凡此種種，均為抄襲前書而致誤者。

第二是時代悠久，因而遺失或竄雜所致。如「史記」自武帝以後，為褚少孫所補。但因此反被後人竄亂，真偽不分。又如薛居正「舊五代史」，因歐陽「新五代史」既出；以文字雅馴遠勝於薛；又以當時貴族崇歐黜薛；致「舊五代史」幾乎絕版。清修「四庫全書」，搜尋「薛史」真本，已不可得；僅從「永樂大典」及明人筆記雜錄中，補綴全書；當不能適合原蹟。其他各史如「漢書」等，亦有少數因年久代遠而至錯誤者；雖迭經清代之考據家分別證補，已大致楚楚；然不能說完全無誤。凡此皆為正史作者所不能預防者。

正史之歪曲錯誤的原因，大概已如前述。我們讀中國史，難道因此而就捨了

「正史」不讀嗎？這也是因噎廢食的錯誤。要知「正史」既然有這樣多的份量；而且爲中國歷史家所依據；雖有許多歪曲與錯誤，我們仍不能不當它是一份最重要最寶貴的史料。那末我們應當如何去讀他呢？

讀正史，首先應當否定了過去封建歷史家的作史態度；而重定辯證的唯物史觀。這種方式，爲了針對着正史的態度而分爲幾點：

第一，否定了尊君抑臣的主旨。從最卑賤的人民中，找出最可尊可貴的事實；從最尊的「本紀」中，認識出這是欺騙民衆壓迫民衆最可恨的最高統治者，更從「列傳」中識別出有些名爲忠臣，實是無恥幫兇替統治者屠殺民衆的凶手；有些是名爲亂逆，實則是替人民說話反對統治惡勢力的人民良友。比如赤眉、銅馬、黃巾之徒，實則都是英勇有爲的革命領袖。當革命軍打破統治者的堡壘京師時，那批階級仇恨最深而怒火中燒的農民大衆，對這班貴族官僚地主們，自然不能不予以報復。正史內所說的焚燒劫掠，應當均作如是觀。「漢書」謂「赤眉發諸陵，污辱呂后尸。」試問以死去幾近三百年之女尸，尚可姦淫；天下豈有是理？至其藏玉棺殉金寶，民衆怒而掘發之；這也是報仇的心理所致。歷代貴族階級在平民死後，把他裂尸焚棺者，不計其數。「正史」毫不責他；而偏說革命軍慘酷。我們應當從歷史階

級的實踐性上，看出他的直實曲直才對。又如漢劉邦明明是一個好酒愛色奸滑最詐的流氓。我們對他的出身，就看得明明白白。什麼「豁達大度」，什麼「子女無所好，財帛無所取」，都是「正史」的虛話。又說：「約法三章，父老大悅。」這父老應當看作貴族地主階級的長老；決不是一般平民的長老。唐李世民縱囚，約期而回，這應當是看作李世民故意與被囚者約好，以示聖德；決沒有回來待殺的愚民。又如李自成破寧武，至宣府，巡撫朱之馮想替主人效力；無奈軍民無一答應；連朱之馮想要自己動手發砲，也爲民衆所阻。在這裏就可看出李自成之得民心。姜瓖等之降李，正是順民心；朱之馮之自殺，正是非常愚蠢。正史指順民心助人民者爲叛亂；指愚蠢者爲忠臣。讀史者必須重新估計得清楚方是。

第二，否定了以意識支配歷史。從「正史」夾縫中，找出現實的歷史、實踐的歷史，以判斷當時上層階級意識之作用。比如「正史」內的「五行」「天文」「律歷」「封禪」「禮」「樂」等書志，佔據了「正史」的重要部分。但這些都是上層意識的鋪張，與人民生活無關。我們正要從它所說的災變裏，看出某處大饑，民相食；某處大水，漂沒多少郡邑；更有昆弟相殺以爲食等事；足見當時下層民衆，陷於如何困苦顛連的境界。從它的反面，又看見帝王建宮殿，築池苑；大臣造里第，

廣田宅；更有封禪祭祀，用了無可計算的國幣；這又足見上層階級之窮奢極欲。兩方對照，則當時社會關係之如何矛盾，立刻可以明白。又從「正史」的「平準」「食貨」「刑法」「職官」等書志裏，看出統治者如何擺佈去剝削人民，去壓制人民；官僚商人地主如何倚勢兼併，如何擴大營業，如何營私舞弊。又從本紀列傳中看出許多寇盜，經官兵剿殺後，好像猶不畏死，仍然此平彼起；這正是階級鬥爭的實踐。所以我們讀「正史」，不應從這些文物制度上看當時社會之治亂；而正要從人民的實際生活與階級衝突中，看當時之歷史形態。

第三，否定自尊而卑人的態度。從正史的「四夷列傳」中，看當時各民族間之相互連繫；有些是中國的商人文士，跑到各方面去；有些是各民族的和傳教士跑到中國來。這種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種族的同化，都應當以平等的眼光去看，方能得其真相。「正史」上又有學派的自尊而卑人的態度：如宋代是道學支配學術界的一朝，明朝亦幾乎如此。因是反道學的，「正史」都加以譏議；尊道學的，「正史」都加以重視。我們正要從他的反面看。王安石並不是像「正史」所說的乖戾，而是一位革新的政治人才。章惇敏識加人數等，而又不肯以官爵私所親，諸子均無顯者。這正是一位明潔的政治家，決不像「正史」所說的好黨。諸如此類，我們都

要反對正史的主觀主義和自尊態度，而以客觀的公正的態度處之。

此外，正史的「紀」「傳」是不相聯繫的；各代的歷史又是不連貫的；我們應當把它連繫起來；還要與其他歷史互證是非，互考得失。正史有同時二史而事實互異者，應辨別出誰真誰假。如此去看「正史」，才能得正史之益。

第三節 論正史以外諸史籍的讀法

史部除正史以外，尙有其他史籍；其數量將千百倍於正史，其體製又非常繁雜，各自爲政。讀史者如能一一閱讀，博聞強識，采撮精華，疏扶譌雜，與「正史」交互參證研究，斯爲上策。第恐時間不許，力有難能，惟有分別輕重，擇要而取，亦不失爲讀史之善法。

諸史中之「編年史」與「紀事本末」二類，過去史家都曾視爲史部重典，與正史須同等看待；尤其是司馬光「資治通鑑」一書，似乎更非熟讀不可。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說法。要知「編年史」與「紀事本末」所用之史料，大多均自正史中採括而成。而且「資治通鑑」完全爲帝王資治之用；其主旨已很明顯，其歪曲歷史真相，替統治者宣傳，較之「正史」，或有過無不及。所以我們對這二類史書，儘

可不必諷誦細讀，但用以參考，亦不可忽。因為「正史」內之「紀」「傳」「書」「志」，在時空上，均不相連繫；而「紀事本末」則以事為題，詳敘始末，在時間上，頗能連貫；「編年史」則以年為分，列各事而系於一年，在空間上，亦能聯及。讀史者以此作參考之資料，頗為適用。況且「通鑑長篇」所記詔書奏議等，均全篇盡載，正可以之補正史之不備。

諸史中之「通典」「通志」「通考」一類史書，過去史家亦多作為參考之用；現在亦作如是觀。惟「通典」中之「食貨」一目；「通考」中之「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各項；因其彙集史料頗多，以此探尋各代之社會經濟狀態，尙可得其端緒。若依其分類，呆板地襲取其史料，不知靈活應用，則必然要落入機械的科學論的圈套。

其餘史流雜著，形色極繁，分量極多；各家分類，又不一致。從前唐、劉知幾曾把它分為十類：以專記一朝代中的一段故事者，謂之「偏記」。以專記自己所熟識的人物者，謂之「小錄」。以搜集「正史」所不載的故事者，謂之「逸事」。以記載民間議論嘲諷及小說卮言等者，謂之「瑣言」。以專載一鄉一郡之先賢者舊事蹟者，謂之「郡書」。以考述家族之來源支系者，謂之「家史」。以選擇諸史中一

部分人物，合乎自己理想之道德人格；爲之編成傳志者，謂之「別傳」。以雜記闕巷異聞民間迷信之說者，謂之「雜書」。以專誌各方地理，或曾經歷過之山川地形及民情風俗物產者，謂之「地里書」。以描寫都邑宮殿市衢城郭及繁華狀況者，謂之「都邑簿」。凡此十類，頗能概括一切。

此類雜著，因形式零碎不整，文字又有鄙野不正者；過去史家，每多輕視。然爲尋求真實史料計；探索民間隱痛計；則「雜史」反重於「正史」。如「偏記」「逸事」「瑣言」「地里書」「都邑簿」等類雜史中，有記載着民族間之仇恨，有記載着統治者及官僚地主商人之貪污無行；有記載着都市之奢靡生活，以反應下層民衆之困厄；有記載着階級鬥爭之實情；有記載着漢族與各民族間之關係；此等史料，均爲「正史」所缺如，而爲研究歷史所不可少者。

我們試看辛棄疾「南渡錄」，曹勳「北狩見聞錄」，蔡條「北狩行錄」等，則當時金人之如何凌辱宋代君臣，可以瞭然如見。又看張知甫「可書」，有「金人侵中國，雅以敲捧擊人腦」之記載；則知當時宋人如何受金人之慘殺。又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則滿族屠殺漢人之慘狀，又可明白。凡此均屬民族仇恨一類的史實，讀史者應當仔細搜尋，切實看出當日民族間衝突之真相；而把一班向

異族主人歌功頌德的論調，完全可以肅清了。

或以「瑣言」筆調，諷刺當世者。如岳珂「程史」，諷刺當時統治階級間的矛盾。曾敏行「獨醒雜誌」，諷刺宋代幣制之紊亂與失信於人民。洪邁「夷堅志」，譏刺當時宰相的貪污。或以「偏記」書法說明當時事實真相。如采九德「倭變事略」，指出奸商勾引倭寇，官僚受賄通敵。夏允彝「幸存錄」及夏完淳「幸存續錄」，指出明代統治者在亡國前夕，尚貪婪腐化，荒淫無恥。凡此均屬記載官僚政府及商人地主之貪污自私一類的史實。讀史者對於各時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內容，必欲探索明白；則此類史書，應當有深切注意之必要。

再看「都邑簿」一類：在「洛陽伽藍記」與「三輔黃圖」中，可見洛陽、長安之城市街道及宮殿佛寺之寬宏奇偉。在吳自牧「夢梁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可見宋代汴京之豪華生活。在余懷「板橋雜記」、雪樵居士「秦淮見聞錄」、捧花生「秦淮畫舫錄」中，可見明末南京風俗之奢靡。凡此均屬描寫都市豪華一類的史實；讀史者加以探索，即可想像當日一方面之享樂腐化；又一方面將如何流離困厄了。

有些屬於「逸書」一類的雜史；如「宣和遺事」、周密「癸辛雜識」等；可以

看見北宋革命英雄宋江等暴動的事實。又如「清代秘密會黨史」（商務出版）中，可以看見滿清一代，漢人如何秘密結社反抗政府。凡此均屬記載階級鬥爭實踐的史實；讀史者要明瞭中國各時代社會關係之矛盾，更非於此等史書中搜求不可。

又於地理書一類：如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等；不但可以看出佛教宣傳之力量，且可獲悉唐代與新疆、中亞及印度一帶各民族之連繫。又如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可以看出明代與南洋各民族之連繫。又如「荆南苗俗記」「兩粵僑俗記」等，可以看出中國境內各落後民俗之情況；而從此更可想見各朝與蠻族交涉之實情。凡此皆屬「正史」「四夷列傳」所不詳；讀史者要詳知各民族間之關係，必須於此類「雜史」中求之。

他若「小錄」「郡書」「別傳」「家史」「雜記」等一類雜文，均足以補正史之闕。惟「小錄」「郡書」「列傳」等所記人物，多屬封建階級之上層，鮮及平民。而「家史」僅錄家族姓氏，雖足備查，無濟大用。「雜記」描寫神怪，近於小說。讀史者權其輕重先後，則此類史籍，當屬次要。

諸史之重要性，已分別說明。惟此類史書，雖多真切之事實；但亦間有任意揮

寫而失真者；亦有傳聞而致誤者。讀史者仍須按當日真實之社會形態；參證他史以定其抉擇；不宜一概盲從，流於以訛正訛之失。

又從「地里書」一類，流廣而爲各地之方志；今日各省府州縣，無不有志；此即各地之史書。「家史」一類流廣而爲各家族之宗譜，此爲各族之史書。「逸事」一類，流廣而爲輯逸、補證、注釋、考訂各史書；今日所存者亦甚多。凡此三類，分量至鉅，決難盡讀；惟研究歷史專題時，亦必取證於此。

此外，尚有各代王朝之實錄及刑政法制，爲「正」史所本；論其敘事之簡要，不及正史；而詳盡過之。惟實錄係御用史臣所錄，事實顯多歪曲，最難憑信；用爲參考足矣。刑政法制，大略已見正史；惟其中刑法律例，對於貴族、平民、家奴，分成等級，刑罰有差，如「明律」「清律」等。讀史者探討中國統治者對民衆壓制之手段時，此亦爲必須參考之資料。至若批評古史，如劉知幾「史通」、孫甫「唐史論斷」、章學誠「文史通義」等，均可作讀史時考訂之助。又有專記經籍圖書之版本來源及著者姓名內容大要等，如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不過「藝文」「經籍」等志之流衍，論其重要性，則在諸史中，尤居其次。

總之，讀史貴乎靈活，采集貴乎精確，推論須不背乎歷史的一般規律性。若固

執主觀的歷史成見，牢守機械的邏輯方法；無論你如何詳博，仍得不到真確的歷史。

第四節 論經子集讀法

一、羣經

章實齋曾說過：「六經皆史也。」誠然，中國的經書，的確都是中國古代的史料；而且有最寶貴最可靠的史料。不過現在所說的羣經，除了十三經的原文外，還有分量極鉅的注釋疏箋一類的附文。這些附文都是繁辭縟說，破碎支離。雖其中訓釋古音古義，較為有用外。其餘大部都是理想玄妙之談，視同宗教經文，並無二致。

就是「十三經」的原文，也有一些是偽造的，我們應當作「偽書」看。有些是屬於傳說一類的，我們應當作「傳說」看。還有古今文之辯，在中國學術界紛爭了近二千年。但我們以科學歷史眼光去看它；正像翦伯贊氏所說：『今文也有偽，古文也有真；只要有考古學做根據，無論今文和古文，皆可引為旁證。』

現在先說「易經」吧；內分「卦辭」「爻辭」與「易傳」（十翼）三者。「卦

辭」「爻辭」當係殷、周間之產物。「易傳」則在春秋時，始成於南方。孔子暮年至楚，可能略見一二。後來在戰國時，流入北地；師弟相承，變爲儒家之重要經典了。「案韓非所謂「仲良氏之儒」，疑卽孟子所謂陳良，僞「孔叢子」所引之橋子良，亦卽「史記」所謂傳「易」之矯子庸疵（「漢書」作橋庇子庸）。橋陳聲轉，庸與良古韻亦通。「史記」謂矯子庸，江東人；「漢書」謂魯人；孟子稱陳良楚產，北學於中國；是則「史記」著其原籍，而「漢書」稱其後學之地。易象、象、均南方之動物。「論語」：「南人有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乃「易」「恆」九三爻辭。又孔子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之嘆。此均可爲孔子知「易」之證。是「易」先創於楚，後傳入燕、趙，中原知者或少。余另有「仲良氏之儒」一篇論「易」原委，此僅舉其大略。」

卦辭、爻辭，雖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書，但正因爲它是真的古代的產物，所以是最可靠之史料。讀史者應細加注意：如「得朋」「喪朋」「利有攸往」及「大車以載」「億喪貝」「得其資斧」「商兌來寧」等辭句，均可看出當時行商事業之雛形。如「喪童僕」「得童僕」等辭句，是分明說出奴隸的購買或逃亡等現象，又如「田有禽」「田無禽」「失前禽」等辭句，是說出狩獵的真相。又如「牛」「羊」

等字所載甚多，足見當時牧畜之盛。「婚媾」「歸妹」等辭句是說明婚姻狀態。「征」「寇」「師」「伐」等字是說出戰爭之情形。凡此均屬古代社會經濟的真實史料，非正史所能找出者。

易傳分量，較卦爻辭爲多。但其中除解釋卦爻辭外，均爲獨具玄理的哲學書。以之研究當時意識形態，亦爲必要之史料。

不過讀「易」者，萬不可爲主觀思想所支配——或偏信了王弼一類的玄學注解，或染上了宋代周、邵的道士色彩。倘使以這樣主觀的玄學思想去讀「易」，則愈讀愈玄，根本摸不着頭腦。只有以辯證唯物的眼光去讀「易」，那末才能把內容分析得清楚。郭沫若氏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四編中，專以「易經」來解釋當時社會生活；雖其中尚有可以商討之處；但其論證方法，確爲讀易者之指針。

再說「尚書」吧。這是一本中國古代的雜史。據傳說：孔子刪「書」爲百二篇。秦火以後，由伏生口授，以今文傳寫者僅二十八篇。西漢末，有古文「尚書」出；較今文多十六篇；至桓、靈時亡佚。晉初梅賾復獻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附僞「孔傳」，即今所傳之「尚書」是。

古文「尚書」，經宋、明、清三代學者之考證；已斷言其爲僞造。而其中可信

爲真者，僅今文二十八篇。不過殷代以前，文字未成，「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決非當時之作品；固不能以其爲今文而信之。而古文經內亦多根據古說；讀者苟能以真實之史料爲主，以此爲旁證，亦無不可。

「尙書」自被儒家把它披上一層厚厚的玄學的外套後，它的真面目就因而暗晦。雖然今文家曾力辨真僞，痛詆古文，亦未能把此玄學外套完全脫光。近來機械論者實驗主義者復以主觀的思想批評「尙書」，任意牽涉強證，其不切實情仍與玄學無異。我們於此，均應廓而清之：以辯證唯物的眼光，依歷史進展的必然規律，與其他考古資料，相互連繫參證；認識出「典」「謨」「禡讓」的傳說，並不是什麼「有天下而不與焉」的聖德；只是氏族公選的制度而已。夏啓之伐有扈，並不是賢君伐暴救民，只是爲了有扈反對父權制度而鬥爭。盤庚遷都，既非順天心而應人事，也非機械的專爲黃河水災；他必然爲着要鞏固自己奴隸主的政權與增加國家的財富而出此。「康誥」「酒誥」「梓材」等並不是聖人諄諄戒弟之言，而且告以謹慎治理異族君民之方法。尤其是「呂刑」一篇，在西周之世，可以罰鍰代殘酷之五刑；此種重視金鍰的法律，決不是簡單地僅以「穆王命呂侯訓刑以誥四方」幾個字去解釋就算了。讀書者必須尋找出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的真相，方可澈底明瞭。

第三，要說到「詩經」了。這是一部古代的文藝雜作。裏面大多是民間歌謠，而且是民間日常諷誦流傳最廣的歌謠。雖然二千年來儒家的注釋，仍有今古文之辨；但詩之原文，却無甚異同。

讀「詩」的方徑，文學家和歷史家自然有些不同。文學家的讀「詩」，要留意辭句、聲韻、及感情的作用等。而歷史家的讀「詩」，則首先就要注意「詩」中所描寫的人民生活狀況與社會關係等。但也同讀「尚書」一樣，切勿爲儒家的注釋所惑：如「七月」一首，描寫着當時農奴的生活如何艱苦忙碌，如何把好好的衣裳和狐裘送給貴族的公子；決不是周代文、武的盛德，使得人民感戴無已而如此忠愛其君。又如「伐檀」一首，描寫着當時的上層階級，可以不稼不獵，而有滿倉之穀，有盈庖之肉；另一面又暴露出窮民的怨嘆聲；這決不是有德的君子，不肯尸位素餐的意思。更在「詩」裏可以看見當時貴族階級所用以壓制勞動者的爪牙。如「七月」「甫田」「大田」各首內，都有一個田畯在監督着農奴工作。又如「葛覃」一首，裏面有一個師氏，監督着女奴工作。這些女奴非得到師氏的許可，連回家看看父母，洗洗衣服，都不能自由。再在「無羊」一首內說明一班飼畜的牧奴，被他們的頭腦牧人率領着。這牧人做起夢來，貴族階級也替他占夢。由此可以知道當時的

社會裏：有農奴在田場裏種田，有工奴在工場裏作工，有牧奴在牧場上飼畜。倘使不從詩經裏細細讀出，那裏會明白這種生產關係呢。至於「詩」之入樂與否？古音、古韻如何？這些問題，都是讀史者所認為次要的。

第四就說「禮經」吧。這裏面包含着三種成份：一是「周禮」，二是「儀禮」，三是「禮記」。

「周禮」是古文，已經多數學者證明它是劉歆輩偽造。我們用讀偽書的眼光去讀它。

「儀禮」也經清儒的考證，認為它是晚周的產物而且不一定是周代的禮制；大多是當時儒者以意推想所作。我們讀它，不能信它為真，只能與其他史實，互相參證時，可能有旁證之助。

「禮記」是孔子以後的儒者所記。據說是漢戴聖所傳。還有戴德所傳的稱「大戴禮」；裏面所說的話，與「禮記」相仿。兩者都是表達儒家的思想。讀史者可從此探索戰國至西漢間儒家意識之演變。

第五就是「春秋」。它是孔子所修的史書；原文非常簡單，所以有了三種傳，都是解釋它的；一是「公羊」，二是「穀梁」，三是「左傳」。

「公羊」是純粹的今文；應當是最真確的古書。不過「公羊傳」的原文，大都是解釋「春秋」褒貶的用意。再經過一批今文學者的注釋傳會，把它搬上玄學的寶座；說什麼「微言大義」，什麼「三科九旨」；於是「公羊」更變得神奇莫測。雖然孔子當日作「春秋」時，或許也有過這樣口誅筆伐的法則。但這些只是替封建社會上層階級作衛士；我們非但不需要，而且要反對它。

脫去了「公羊」的神奇的外套，還它一個純潔的原文；讀史者還是需要讀它。因為它裏面存在着許多真實的史料。

「穀梁」比「公羊」來得無價值。它是一部抄襲「公羊」左氏雜拉而成的書。讀史者看過了「公羊」「左氏」，這部書用不着細看了。

「左氏」雖然是古文，却記載事實很富。讀史者也可作為研究古史之資料。不過它原是「不可靠的古文」。我們考證春秋時代史實時，還應多憑「國語」及「金文」等為證；不要偏信「左氏」，以致為偽書所誤。

第六就是「論語」。它是孔子學生所記的語錄；而且大部份還是可靠的古書。讀此可以探索孔子政治思想，及當時的社會動變的形態。不過切勿為儒家的注解所惑，而要以新的科學的眼光去看它。

第七就是「孟子」。它為一般學者證明是沒有偽造的成份。不過是否完全「孟子」自己執筆的，還是成問題。我們可以從它裏面，看到許多古代傳說，及當時儒家敵派的議論，與儒家思想的變遷等。

第八就是「孝經」。據一般學者考證，它是一部偽託孔子傳給曾參的經書。不過我還有點懷疑：因為韓非所說樂正氏之儒，我疑他就是樂正子春。他是以孝行著稱，又是曾參的弟子；或許戰國時有一派儒家專以孝行為標榜，而孝經一書，正是此派的經典吧。

「孝經」無論是真是偽，它總是一種漢代以前的實錄。我們讀此，也可以明瞭當時上層階級思想的一面。

第九要說到「爾雅」了。它並不像其餘的經書；只是一部古代的名物辭典。正因為它是古辭典，讀古史時，就要應用到它。

四庫經部除了以上所說的十三經外，還有許多像「說文」一類的小學；這也和「爾雅」一樣地可以作為解釋古書之助。

二、諸子

一部數量浩繁的諸子書籍，中間雜着不少的偽書；我們首先應當辨明它的真

偽。這一步工夫，雖然可以憑藉着許多先代學者考證的成績；但是許多仍未完全辨清，尚待後學繼續努力：如「管子」「商子」「孫子」等及近人輯出之「尹文子」「公孫龍子」等；還有真實的子書內，也有存着贗品。這些，都不能不辨個明白，才可作爲研究先秦社會史之用。

子書的作者時代，倘能分別辨明，則偽書和真書，仍可同等看待；依它的作書時代，探討當日的社會情況，與作者的思想。至於子書內說到周代以前的事實，不論它真書或偽書，應一律當它是神話和傳說看。

讀子書，有幾點應當注意的：

第一，子書大多是作者表達自己的學術思想；所以都有是己非人的論調。我們讀子書時，正要在其非人的議論中，尋出他人之是否可非；再把那被非之人的議論找出來比較研究一下，才能得到中正的斷語。比如在「莊子」書中看見他批評墨子「行難爲」「使天下不堪」。在「荀子」書中看見他批評墨子「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在「韓非子」書中看見他批評墨子：「以武犯禁」，「帶劍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又找到孟子也曾說：「墨者愛無差等」，「墨子兼愛是無父也」。這些批評墨子的話，我們把它歸納起來；和墨子自己的說話交互研究，那末

就知道墨子是如何一個尚儉約，重氣節，而帶有宗教性質的學者。再如子思、孟子是被儒家尊爲「述聖」「亞聖」的超人。可是看過「荀子」的批評；他倆是「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如此駁雜的儒者，並沒有像宋儒所說的什麼「尊德性以致廣大」，「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聖人。并且我們還由此可以看出「中庸」裏所說的許多「率性」「修道」「鳶飛」「魚躍」「至誠先知」等避遠幽隱的議論，正是子思氏一派的儒家所說。清、崔述疑其僞，近人亦證其非子思所作。我到要信他確是子思氏一派的著作；不過其中稍爲後人竄雜而已。

第二，看子書須要認明作者的意識，是適應當時某一階級；作者的身份，又是屬於某一階級。因爲意識形態是被決定於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關係；宮殿裏的人們和茅屋裏的人們，兩者的意識決不會一致。固然在同一階級的生活中，也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論調。但這是在最高的原則下統一的。比如儒家、法家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各階層說話。儒家是想用仁義道德來和緩階級間的衝突；藉此以穩定封建秩序。法家是想用強制執行的法的權威來保持統治階級的力量。兩者雖然彼此攻訐，而最高的原則是統一的。又如墨家因爲唱着「兼愛」的學說，似乎是替

農民階級說話的。又唱着「尙同」「天志」「明鬼」等說，又分明是一個宗教家！只會替封建上層階級作護符。但我們細看墨子的行動：曾經做過統治階級的貴賓。他的宗派的鉅子，又多為統治階級所尊仰；如秦惠王之敬腹辯；及腹辯之殺子以守秦法。又如墨家與儒家同為戰國時的顯學；那時的學派，若沒有得到統治階級的同情，決不會讓他四出宣傳而成爲顯學。由此我們可以斷言：墨家雖然唱着「節儉」「兼愛」；但是最高的原則，也是替統治階級說話。不過他的政治的理想和方式，與儒家、法家不同。在戰國時，站在農民階級與農民一道生活的，恐怕只有許行和他的弟子們。在孟子與陳相的辯論中，可以看出他是不贊成不勞而獲的人。連滕文公這樣禮賢下士，他也認爲不對。他的學說，當時一定有很多人信從他；連儒家的徒弟也走向他的門下。不過因爲統治階級的不同情，甚至要壓迫他；所以他決不會成爲顯學；而且連一點文學都沒有遺傳下來。這種情形，我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還有一個楊朱；孟子說他「爲我」「無君」。他的學說，也恐怕爲了「無君」而被統治者所厭惡而至於無傳了。但楊朱的「爲我」，決不會是農民大眾的代表者。所以看諸子，一定要從當時的社會關係中識別出他的意識的從屬；斷不能僅從文字表面上推論，而落入觀念論的玄學的圈套中。

第三，要以變動靈活的眼光去看諸子。因為諸子各有宗派。每一宗派又都隨時代而變遷。其變遷的原因，又是決定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轉變。比如儒家從孔子起，一直到清末的老師宿儒；不知變了多少形態。我們萬不能以為他都是稱道孔子，都是自號儒家，就認為他是同一思想。韓非子曾說過：孔子之後，流為八派。墨子之後，分成三途。這種分異，不是他個人的意志自由創造；而是被當時社會經濟關係所決定。因為孔子的時候，是初期封建制度漸漸破壞，大封主兼併小封主，大封主屬下之小領主又擴大其權力，將篡奪其封建主的地位。在這樣的狀態下，才有孔子的仁治思想。到了戰國時代，商人地主漸漸興起，與舊領主發生衝突；所以有了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改良政策。到了戰國末年，商人地主要求建立統一的專制的王權；所以有了荀卿的嚴格的禮治主義。以後漢代的董仲舒之儒；隋代的王通之儒，唐代的韓愈之儒；宋代的濂、洛、關、閩之儒；明代、王陽明之儒；以及清初顧炎武、黃宗羲之儒；清末康有為之儒；雖然都是一樣地替上層階級想辦法；但是社會經濟機構已經變遷；他們的意識也隨着改變，而且變得完全不像孔子了。

再說漢代以後，各派消沈，只有儒家獨尊。這不是儒家的學說能够僥倖存在；也不是儒家最合統治者的心理，其餘各家都非統治者所歡迎。要知漢代儒術之興

尊，是諸子學說辯證的統一。漢代以後的儒家，是從先秦諸子百家的遺跡上建築起來。說它不像諸子，連孔子也不像。說它像孔子，連諸子都有幾分像。從漢代這大統一以後，仍然立即要發生矛盾，要繼續變化，讀子書的萬不能以固定的眼光看它。

三、集部諸書

集部諸書，幾乎都是文學作品；只有少數是表達自己的學術思想：如韓愈「原道」一類。集部幾乎完全是可靠的書籍，沒有偽書，沒有竄改歪曲，只是「楚詞」的作者，略有問題；與後來一些少數的版本，略有錯誤而已。

讀史者對於這一部浩繁的文學作品，是否應該去讀它？若說應該讀，那末如何讀法？

我以為集部也是讀史者所應讀的。因為一部「中國文學史」，當然要從這裏取材。即使不專門研究「文學歷史」，也必須讀它。因為它裏面還存在着各時代的社會的一角或一點的肖像。這些肖像，往往是「正史」裏所不敢道或是道得正相反的。我們有了它，可以補救「正史」之缺漏與錯誤。

先說「楚辭」吧。它裏面有一篇「離騷」：從前人說它是兼有了「好色不淫」

「怨悱不亂」的雙重美德；又說他是「金相玉式」「豔溢鎔毫」的好文章。我們對於這些主觀的批評，都可以不管；應該從作者的內心誹怨中，看出當時楚國的黨爭情形，與屈原的如何見逐的真情。其餘「楚騷」，也要一樣深刻地探察當時楚國的民間生活狀態，與神話傳說的來源。

次之，說到漢賦。如「兩都」「兩京」都是洋洋大觀的文章。可是我們讀史者正不以為它是「鋪采摛文，寓意寫物」的巨製，而是要看它所描寫的：都市如何繁華？建築如何壯麗？以及許多的異樣的名物，如何彙集等情。且可以此明瞭當時統治階級之奢侈生活，與反映敵對階級之苦況等。

漢賦中除了這許多堂皇的巨製外，還有一些零星作品，到是一種歷史的好資料。比如王褒的「僮約」，從前人說它是「談諧滑稽」的文字。但依歷史家的眼光去看；它裏面正暴露出漢代富家的生活與奴隸的販賣情形，及奴隸的工作條件；都在賣券內注定。

第三，說到唐詩。那裏面真有許多寫實作品，把「正史」絕不敢道的民間隱痛，盡情地表達出來。如杜甫的「石壕吏」「新安吏」，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等，都是描寫當時政府強徵兵役的慘狀。如元稹之「田家詞」描寫當時農家被政府

搜括得無可爲生的情形。又如白居易之「輕肥」「歌舞」「買花」「傷宅」等，都是描寫當時貴族之豪華生活。韋莊之「秦婦吟」，描寫長安人民在黃巢進入時的動亂狀況。這些都是研究唐代社會生活必要的史料。

第四，說到宋詞。那是因爲辭句不長，所以未能盡情地表達出當時社會生活的詳情。更因作者都是屬於地主官僚階層的人物，所以又很少能深刻地描寫出當時人民的實況。不過在北宋的詞中，有些也可以看出幾個豪華都市的奢靡生活與人口的衆多。在南宋的詞中，可以看出中原淪陷後一般小地主階級與進步的知識份子，如何抱着感慨痛恨的心情。這些也都可以補「正史」之不足。

第五，要說元曲。它比宋詞已能進一步寫出民間的苦痛來。如「硃砂擔」「馮玉蘭」等曲，暴露統治者的暴行；「凍蘇秦」「薦福碑」等描摹知識份子之陷於饑餓等。這些也是研究元代社會生活的史料。

第六，要說到明、清兩代的傳奇與章回小說等。這些文學作品，真能透露出民間的真情。如「水滸傳」裏的許多人物，都遭到官方的無理迫害而走上暴動之路。如「桃花扇」中的許多官僚宦黨，貪污舞弊，對外投降，對內殘殺。如「紅樓夢」裏的賈府，豪華腐敗而至於沒落。尤其是「儒林外史」中寫出當時的有些知識份

子，如何熱中仕進；有些知識份子如何假作清高，有些知識份子，如何窮到賣去兒女；有些官僚階級的家庭，如何奢侈無聊；有些鹽商大賈，如何趨勢營利。這許多社會的真相，我們必須從這些小說裏去找尋。

此外，還有許多歷代的小品散文，如柳宗元「捕蛇者說」等；也能把當時社會的一角或一點的真情，確實地傳達出來。

總之，讀史者之讀文學作品；不是鑑賞它的文辭的秀雅，節奏的合奏，音韻的鏗鏘；而是往文學作品裏搜尋出它所描寫的社會狀況；更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瞭解文學作品的適應的變遷。這樣互相關繫地研究，才能得到真正的歷史知識。

再者，我們又要靈活地去看：如「水滸」所說的宋江，是宋徽宗時的人物。但我們不能把時間固執着，真個當它是宋代的社會故事。要知作者是初明時代的人，他所看見的是初明的事實。這種逼上梁山的故事，正是象徵明代暴虐的政治。又如「儒林外史」所指的是明代的故事，但作者是清人。我們一定看出清代的社會有如此形形色色的生動的狀態。

文學作品中不免有誇大的描寫；有添上色彩的可能；還有依作者主觀的雕塑而

變得有些不像真相。這都是要讀者以靈活的眼光去看。

第五節 論「四部」以外各種文字與地下發掘之史料

「四部」以外，尚有許多文字紀錄，爲人所不經意而却爲史家所不可忽略者：如宗教之經典（釋道舊屬子部，現各自行庫藏），政府機關之檔案，鐘鼎彝盤碑石等之銘志，私人之函札雜記，以及雜誌報章等；無一非史料，亦無一非史家所樂取者。

還有近數十年來陸續發掘之甲骨文，以及無文字之古代人類遺跡——如石器、骨器、金屬器具及各種化石遺骸等，更爲研究古史之寶貴資料。

試就佛典言之：雖然大多是迷信的說法及許多古印度的神奇傳說；但裏面也有說及中國南北朝及唐代的僧人故事者。這就對於中國史有幫助了。並且讀史者之讀佛典，若僅是看他所說的話，有些牽涉到中國的社會，就可以作爲說史的旁證；那還是小覷佛典了。倘使我們真個要研究「中國學術史」，那就須追尋佛教的教義，爲什麼能在中國發揚光大起來？把中國原有的儒家，都能同化了。或許說一點深刻的話：是佛的靈魂如何能够附着在儒的身體上？還把中國的文學都轉變了，成爲佛

經體的語錄文章。這種變化的表象，我們正要聯繫地研究：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容上，識別出他的學說，所以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而深入民間的原由。

機關檔案，也是真實史料。清代康、雍、乾三朝與歐洲俄、法等國，均有文件往來。羅振玉曾將檔案之一部編爲「史料叢刊」；王芷章就清代宮庭戲劇編爲「清昇平署志略」；王彥彙集一部份外交檔案，編爲「清外交史料」；還有太平天國之文書檔案等，近人有搜采編集「太平天國史料」之議。其他各地方機關之檔案，亦均有寶貴之史料存在。這些史料，在研究專題或專史時，均應搜閱以作佐證。

金石銘志與歷史關係尤大。西周一朝的史實，大多以金文爲依據。郭沫若氏之「兩周金文辭大系」，搜集金文最富，辨訂最明；爲歷來考訂金石文字之較佳者。還有歷代之碑石銘志，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開封「挑筋教人所建碑」，「九姓回鶻可汗碑」等，各記着中國以外諸宗教傳入中國情形。又有各地之墓志，祠廟之碑文，每每記載着當地風俗及當日物價等；以歷史家的眼光去看它，都是瑰寶了。

私人函札雜記，一部份有名的，已入史、集二部。其零碎而不足道的，爲史籍所不采爲文集所不收者，到還有許多寶藏，可供歷史家之搜取。如民間俗事、家庭

雜務，往往見於不重要之函札雜記中。此等史料，若從以探求真實之社會生活，得其用。

再如雜誌報章等，更顯然是可貴的史料。我們在其中擇定一類，彙集起來，都可成一專門的歷史，至少也可以成一專題之研究。

總之，歷史家之於史料，當然愈詳博愈好。梁啓超謂「店家之積年流水賬簿，可以觀察物價之變遷與社會生活之大概情形。」這話說得很對。

第六節 讀中國史總論

前面已經把中國史籍及史料的閱讀方法，大概說過了。這分明是要讀史者讀得愈詳博則對史實的判斷愈真確。不過我們所說的博；並不像封建性歷史家們的局限於上層階級的言行的博學，也不像資本主義從屬者的歷史家們，機械式的呆板的博學。我們是以歷史的實踐性與連繫性的看法，及辯證的法則，去要求博學。

所以我們讀史，仍舊可以分析；但同時就是綜合。這分析與綜合，不是分離隔絕的；不是呆板機械的；也不是僅僅局限在一個表象上；而是以整個的史實爲前提。從此所獲到的各方面與各部份，都是連結制約。比如某一時代的社會；有農耕

勞動的形態，有工場牧場等勞動的形態，有家屬奴隸的勞動形態；有上層階級支配的諸形態；有下層階級抗爭的諸形態。諸如此等各方面的形態，其實是整個的聯繫着的，成爲一個某階段的社會。而且這階段的社會，又是連接在整個歷史中，而依規律地變動發展着。

我們讀史，仍然可以比較。這比較不是呆板的以格律方式去比較；也不是把史實切成片斷的零碎的去比較；而是靈活的不背歷史進展的法則去比較。比如認定了殷代是奴隸生產制度，我們就可以拿周代的生產形態去和它仔細比較：其中生產者之被支配，生產工具之改進，生產手段之被分割等；均須比較出其差別之程度，而後才能明瞭其爲不同性質的社會。又如周以後各時期的進展情形；我們若不從各時期的生產方法的事實上比較出其進步的真情；而僅含糊地指爲不同的封建社會；決不能廓清循環論與永恆不變論的暗影。至於每一時期的發展不均衡的狀態，也須以比較方法求得之。

我們讀史，須要精思，但同時須要謹慎判斷。但這精思，不是默坐在明窗淨几之上，憑自己的主觀任意地想入虛無飄渺的境界；而必須依據具體事實去思考，從歷史的發展的規律上去思考，從交互連結的關係處去思考；而且使主觀的思想與客

觀的事實得到辯證的統一。這與過去封建歷史家們及資本主義從屬者的歷史家們的思考方法完全不同。由這樣的精思而謹慎地得到判斷的概念，就是客觀事實的規律性聯結的某種反映的方式。

由此可知我們倘能以新的科學方法去讀中國史；自然不會以史籍太多而感到複雜；反以史料不為憾事。所以讀中國史籍，還要讀其他各國的史籍；不僅讀史籍，還要讀其他科學的書籍。這在整個的連繫性上說來，應當各方面的交互關係都明白了，才能明白人類進展的真實內容；才能把這一整個過程中的一部份的中國史，獲得明白的認識。

——完——